

ISSN 1674-2516
CN31-1620/F

供销合作经济

GONGXIAO HEZUO JINGJI

上海供销社携手抗疫，共克时艰

ISSN 1674-2516



9 771674 251203

04>

2020

2020年4月28日版

总第201期

上海供销社携手抗疫，共克时艰

刚刚过去的一季度，有太多故事值得书写。

面对来势凶猛的疫情，上海这座有着2500万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必须反应迅速。上海供销社系统也没有含糊，作为郊区商品流通的主渠道肩负重任。依托系统独特的网络和资源优势，上海供销社无论是医疗物资购销和调运、保障供应、稳定物价，还是捐款捐物帮助一线抗击疫情、调配农资支持春耕生产、助力复工复产恢复经济生活，都在精心组织、全力以赴。

在这场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战大考中，上海供销社人相信“微光成炬、聚沙成塔”的力量，不缺位，不懈怠，有成效，有作为，书写出一份初心答卷。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5年来，上海供销社锐意进取，多点突破，系统经济实力、发展活力和服务能力大大增强，在这场疫情大考中展现了实力和担当。

春风又绿江南岸。当上海这座城市慢慢恢复往日的生机和活力时，上海供销社向着新的目标，进发！

以决战决胜的精神状态不折不扣完成脱贫攻坚各项任务

4月16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召开全国供销合作社扶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近期关于脱贫攻坚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对全系统投身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总社理事会主任、党组书记喻红秋在会上强调，全系统要以决战决胜的精神状态，不折不扣完成脱贫攻坚各项任务。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副主任韩立平主持会议并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要求。国务院扶贫办党组成员、副主任洪天云和总社有关领导出席会议。

喻红秋指出，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投身脱贫攻坚的责任感使命感，充分认识脱贫攻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做好今年脱贫攻坚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及供销合作社在脱贫攻坚中肩负的职责使命，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推进脱贫攻坚。当前，脱贫攻坚到了全面收官的最紧要关头，全系统必须坚决听从习近平总书记号令，闻令而动、尽锐出战，把疫情防控期间激发出的顽强斗志转化为投身脱贫攻坚的强大力量，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冲在前、做实事、见成效，展现供销合作社在关键时刻的责任与担当，诠释对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绝对忠诚。

喻红秋要求，全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总社《关于大力弘扬互助合作精神全力做好扶贫工作的倡议书》和《关于全力投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通知》要求，以脱贫攻坚为统领，抓纲举目、聚焦重点、总体推进，全力完成剩余脱贫任务，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作出新的积极贡献。要继续聚焦深度贫困地区，采取有力举措向“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和52个未摘帽贫困县聚焦倾斜，建立东西部供销合作社对口扶贫协作机制，探索建立扶贫协作产业联盟，打造供销合作社展会品牌。要密切关注疫情对脱贫攻坚的影响，着力解决好贫困地区农产品滞销问题，继续加强春季农业生产服务，推动供销合作社扶贫项目全面复工复产。要齐心协力运营好“扶贫832平台”，各级供销合作社要全力支持平台建设，扎实做好供应商组织、包装物流、质量把控等各项工作。要立足职责做好消费扶贫，大力推进农产品产销衔接，加快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各单位要带头开展消费扶贫。要用心用情做好定点扶贫，持续在产业发展、资金投入、人才培养、发展思路上为贫困县做实事。要综合施策巩固脱贫成果，持续推进扶贫产业发展壮大，发挥行业协会的带动作用，增强贫困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同时，各地供销合作社要坚持把投身脱贫攻坚与服务乡村振兴、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实施供销合作社培育壮大工程有机结合起来，统筹谋划、一体推进。要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强化督促落实、改进工作作风、加大宣传力度，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韩立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决扛起脱贫攻坚重大政治责任，将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供销合作社系统不折不扣落实到位。要狠抓工作落实，切实做到责任到位、人员到位，聚焦重点工作，细化任务分工，全力完成剩余攻坚任务；持续加大帮扶力度，积极引导和支持系统企业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巩固提升脱贫成果，优先在贫困地区推动供销合作社培育壮大工程落地见效；要抓党建促脱贫攻坚，各级党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要勇担当、冲在前、作表率，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要坚持统筹兼顾，把脱贫攻坚与各项工作结合起来，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持续做好保供稳价工作，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加快推进综合改革各项任务落实，努力把疫情造成的进度损失抢回来补回来，确保供销合作社系统经济平稳运行。



主管单位：

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

主办单位：

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
上海市供销合作经济研究会

出版单位：

《上海供销合作经济》编辑部
主 编：马晨辉
副 主 编：王伟星
胡建华
责任编辑：陈 峡

发行：

《上海供销合作经济》编辑部

二〇二〇年第二期

(总第 201 期)

2020 年 4 月 28 日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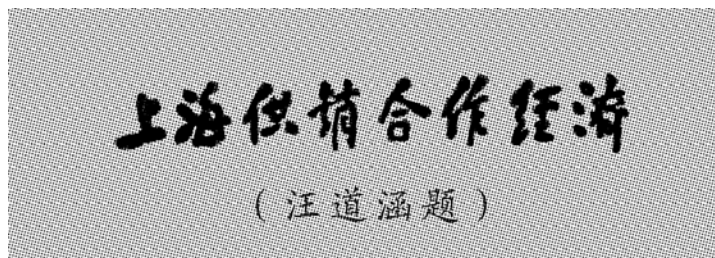
双月刊·公开发行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4-2516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1620/F



目 录

领导讲话

以决战决胜的精神状态 不折不扣完成脱贫攻坚各项

任务…………… (1)

专 稿

坚持稳中求进 加快改革创新

努力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双胜利……………张 华 (5)

供销前沿

“供”但使命 并肩战“疫”……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 (8)

三农论道

2020 年乡村产业十大关键词……………商 远 (11)

1982~2020 年 22 个中央一号文件概要(上)……董 明 (13)

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王 洋 (15)

流通方略

疫情冲击下数字农产品流通模式的探究……………洪 涛 (16)

“供销 e 家 品牌之家”……………孙振华 (18)

加快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的思考……………王传雄 (19)

农村金融

内置金融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韩朝华 (20)

建立金融服务乡村振兴长效机制·····胡金焱 (23)

试论农村金融转型发展·····何广文 何 婧 (24)

供销视窗 ······ (27)

研究与探索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所有制结构变革发展要论

·····傅尔基 (29)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公式的新贡献

·····黄文忠 (33)

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的历史发展·····朱国栋 (39)

循环经济

可回收物增量背后的思考·····史少铭 (42)

法制天地

关于《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要点简介·····杨忠德 (44)

春日读诗

梨花风起正清明·····袁 浩 (46)

食林趣话

五月新鹅上市来 ······钱桂华 (47)

方寸世界

黔行散记·····刘古武 (48)



中国供销合作社
CHINA CO-OP

地 址：

上海市大木桥路 247 弄 2 号 2 楼

电 话：(021) 64183952

传 真：(021) 64183952

E-mail: gxxhgxxh@qq.com

邮政编码：200032

定 价：4.00 元

印 刷：松江区华亭印刷厂

《上海供销合作经济》杂志理事会成员名单

理 事 长：马晨辉

副理事长：(按姓氏笔划为序)

陈仕军 金慧明 祝加林

宫鸿冰 黄 胜 黄瑞华

秘 书 长：王伟星

常务理事 (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晨辉 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
上海市供销合作经济研究会会长
王心雄 上海市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主任
王伟星 上海市供销合作经济研究会秘书长
王德强 上海市杨浦区供销合作社主任
田晓磊 上海新农村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朱国平 上海市奉贤区供销合作总社主任
朱松林 上海市长宁区供销合作社主任
朱建国 上海市金山区供销合作社主任
孙忠明 上海卢湾供销合作社主任
孙耀华 上海乐凯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代凤 上海市普陀区供销合作社主任

陈仕军 上海市松江区供销合作社主任
沈金华 上海市青浦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主任
汪巍忠 上海新嘉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自强 上海昊元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志鹏 上海敏好唯加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金慧明 上海市闵行区供销合作总社主任
祝加林 上海市供销合作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赵志刚 上海市徐汇区供销合作社主任
宫鸿冰 上海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顾 共 上海市棉麻有限公司总经理
桑 佳 上海南汇供销合作总社主任
徐若海 上海市黄浦区供销合作社主任
黄 胜 上海市崇明区供销合作总社党委书记
黄瑞华 上海浦东新区供销合作总社主任
蒋国平 上海市果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理 事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超 上海市供销综合商社管理中心主任
朱建强 上海今晨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龙宝 上海浦东登丰农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金国 上海邵万生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坚持稳中求进 加快改革创新

努力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双胜利

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 张 华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如期实现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阶段性目标任务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实施市社2020-2022年综合改革行动计划的开局之年。2020年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中发〔2015〕11号和沪府发〔2016〕16号文件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全国总社和市国资委两委部署要求，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目标，坚持改革强社、服务立社、夯基建社、以企兴社、从严治社的总要求，全力推进综合改革攻坚克难，全力推进社有企业做强做优，在服务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中发挥供销社独特优势和作用，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双胜利，以优异成绩迎接上海市供销合作社建社70周年和上海市供销合作社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

一、强化使命担当，着力推进疫情防控和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1、全力抓好疫情防控和稳增长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发挥供销社组织优势、流通优势、网络优势和服务优势，在疫情防控和物资供应保障中体现供销社的责任担当。要全力保障全年农资备耕供应，推进基层农资网点为农民提供周到便捷服务。同时要充分预估疫情对全年工作造成的冲击和不确定

定性，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工作两手抓，坚持统筹兼顾、精准施策，努力将疫情造成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争取实现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2、积极参与上海“两个减量化”工作。发挥供销社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上的传统优势，主动与政府主管部门开展工作对接，参与本地区“两网融合”点、站、场体系建设，加快构建市、区两级资源回收利用体系。着力发挥市、区两级再生资源行业协会作用，推动同业经营企业联合合作，培育环境服务型龙头企业，为供销社参与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提供重要支撑。围绕郊区化肥、农药减量化目标，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优化调整农药化肥经营储备结构，开展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加快推进高标准农资大型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中心建设。

3、主动融入上海“四大品牌”战略建设。加快推进供销社老字号品牌集成店建设，立足“农民与市民、农业与商业、线上与线下、品牌与服务、品质与生活”，形成融合发展的老字号商品运营流通管理新模式，年内确保完成15家集成店开业运营。各区社要深入挖潜、优化效能，进一步推动系统内老字号品牌价值提升。

4、参与对接长三角一体化、进博会等重大战略任务。依托上海大市场、大流通优势，积极探索联合合作，为全国各省、市地方供销社精选优质农产品提供专业类或综合类展销平台。紧紧抓住每年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境外商品服务荟萃的溢出效应，主动作为，联手国内有

资质的企业，加强与国外参展商的联络，开展业务合作，实现进口业务常态化。

5、多措并举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立足和发挥供销系统特色和优势，采用产业扶贫、消费扶贫、科教扶贫等方式，帮助贫困农户增收致富。各区社要根据当地党委政府要求，继续开展好贫困对口帮扶，发挥好贫困地区农产品展销中心、爱心流动车、爱心超市等已搭建的平台资源效能，推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以实际行动助推精准扶贫脱贫。

二、聚焦重点领域，着力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攻坚克难

6、研究制定 2020 年供销社综合改革重点工作。今年是实现沪府发〔2016〕16 号文件提出的阶段性目标任务的关键之年，要在市综合改革联席会议办公室指导下，对标中发 11 号文件和沪府发 16 号文件提出的目标任务，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集中发力，研究制定 2020 年供销社综合改革重点工作，筹备召开市政府综合改革联席会议，扎实推进供销社综合改革走深走实，确保供销社综合改革文件提出的硬任务和各项要求贯彻落实到位。

7、全面开展综合改革完成情况自查和评估验收。市、区两级供销社要继续狠抓任务落实，对标文件目标任务，列出清单，建立台账，对确因特殊原因无法如期完成的，要说明原因，提出下一步工作意见。各涉农区社要重点对标本地区出台的综合改革文件，在上半年组织开展自查。要按照全国总社的统一部署，做好综合改革评估验收和经验复制推广工作，推动综合改革由点到面、全面推进、取得实效。

8、推进落实供销社综合改革重点任务目标。全国总社近期下发了《2020 年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重点任务指导性目标》，作为硬任务下达了新建基层社、农村综合服务社、连锁经营网点、庄稼医院和新增土地托管社会化服务面积等指标。各涉农区社要认真领会贯彻全国总社提出的做强供销基层组织、提高为农综合服务能力的工作导向，结合自身实际，努力完成各项重点任务指导性目标。实施 2020-2022 市社综合改革新三年行

动计划，推动市社本级综合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突破。

三、服务乡村振兴，着力推进供销社为农服务能力水平提升

9、着力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市社系统要全面提高服务“三农”能力，在实施乡村振兴中下好先手棋、当好先行者。一是加快构建综合性、规模化、可持续的为农服务体系。复制推广浦东供销联社乐农综合服务站模式，进一步打造集农资、技术、金融、信息为一体的“数字乡村”服务平台。金山、青浦区社建设多功能为农综合服务经营网络，制定管理标准，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点。按照全国总社下发的农村综合服务社星级评定标准，组织涉农区社积极开展为农综合服务网络建设。崇明区社推进生猪屠宰中心排污设施改造，继续做好生猪定点屠宰，确保食品安全。二是促进供销粮油深度融合。松江、奉贤、金山、嘉定等区社继续做好粮库建设改造、粮食购销、储备粮转化、军粮供应等工作。逐步建设并推广粮食上下游产业链一体化经营服务模式，推动区域大米品牌化发展。三是参与优质农产品种植，引领绿色生态农业发展。嘉定、金山区社尝试参与和优化绿色水稻、蔬果等优质农产品种植，扩大农业示范引领领域，加强农产品品控管理和可追溯体系建设。

10、着力提升社区商业服务能力。继续推广“社镇合作”，宝山、浦东、奉贤、崇明区社积极参与大型居住区、轨道交通、老街改造等配套社区商业建设运营和轻资产社区商业合作。继续提供和优化社区高品质农产品流通供给。嘉定区社启动娄塘养鸡场改造农副产品配送中心建设，进一步健全供应链服务平台。浦东、奉贤、崇明、普陀、青浦区社继续推进菜场改造、供销超市和生鲜超市建设，保障农产品销售供应。

11、着力推动农业新兴产业发展。发展休闲农业、创意农业和乡村旅游，提升都市农业综合效益。松江区社推进云间吾舍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三年规划落地落实。崇明区社深入探索文创产业，全面推进千帆堂美术馆正式对外运营。宝山

区社推进横沙岛“呆住”酒店开业，探索建立生态岛民俗合作社可行性。

四、创新体制机制，着力推进供销合作社治理体制治理能力现代化

12、进一步加强“三会”制度建设。贯彻落实全国总社下发的“三会”制度建设文件要求和供销社章程规定，按期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充分发挥理事会作为执行机构的重要作用，强化监事会在促进供销合作事业健康发展中的监督职能。尚未健全“三会”制度的涉农区供销社要尽快拿出组建方案，创造条件，在2021年前召开社代会。年内组织召开上海市供销合作社第六次社员代表大会，并将组织举办上海市供销合作社建社70周年纪念活动。

13、进一步加强组织体系管理和社有资产监管。以《供销合作社条例》出台为契机，研究制定健全供销社组织体系管理办法，切实保障供销社组织体系、供销社财产权益和社有资产完整性，保障资产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相统一。加强市社领导班子与各区供销社的联系指导和服务，形成上下贯通、整体协调的运行机制。

14、认真贯彻执行全国总社“供销合作社培育壮大工程”。以发展壮大基层社、健全基层组织体系和提升联合社指导服务体系为重点，积极参与基层社组织建设工程、千县千社振兴计划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惠农工程，积极参加“四社”创建申报，着力夯实基层基础、创新体制机制、推进联合合作，推动供销合作社高质量发展。

15、积极探索传统基层社和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融合发展模式。创新发展合作经济基层组织，各涉农区社要加大领办、参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力度，探索发展不少于1家区域性、行业性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探索创新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加强各环节主体协作协同，形成利益共享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带领农民增收致富。

五、坚持提质增效，着力推进社有企业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6、加快推进涉农企业创新转型。坚持为农服务的根本宗旨，加快推进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快形成新兴增长点、新增长点和新支撑点。

努力发挥上海供销合作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在服务乡村振兴、推动供销系统做强做优主业中的积极作用，全力推进落实好唯加公司产能提升、果品公司农产品冷链设施和农资公司农化服务中心等项目落地见效。

17、加快推进社有企业联合合作。聚焦为农服务主业，创新商业模式，推进社有企业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推动优质资源向为农服务骨干企业集中，促进系统社有企业利益共享、共同发展。发挥供销合作社品牌、信誉、资源、业务等协同效应，有效放大社有资本功能。

18、加快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健全。坚持“两个一以贯之”要求，切实加强党对社有企业领导，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与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建立健全权责对等、运作协调、有效制衡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强化企业内部管理，强化管理制度和内控体系执行刚性约束，多措并举将本增效，切实防范各类风险。

六、加强党建引领，着力推进全面从严治社各项工作

19、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部署，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定政治立场，严明政治纪律，严格落实“两个责任”，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层层传导压力，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供销合作事业长期健康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20、严格监督管理。要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建立健全覆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制度体系，强化制度执行，层层落实保值增值责任。促进监事会和社资监管、人事、审计等监督资源共享，形成监督合力。规范供销合作社标识推广使用，杜绝借用、滥用、冒用标识的行为。

21、激励干部职工担当作为。全系统要不断完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做到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加强供销合作事业人才队伍与文化建设，汇聚和形成推动供销合作事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本文系市社第五届理事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发表时有删节)

“供”担使命 并肩战“疫”

●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

口罩告急、酒精告急、药品告急！

道口松不得！春耕等不得！复工慢不得！

2020年的春节太特殊了。在新冠肺炎疫情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场危机、大考面前，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始终保持最挺拔的姿态，依托系统资源和网点优势，全力以赴、精心组织、争分夺秒，做好医药物资生产和调动，努力保证所有与预防疫情相关的用品、药品不断货、不脱销、不涨价，在抗“疫”中发挥了供销合作社的独特作用和应有担当。

不仅如此，在保障春耕、维护道口、稳定复工方面，市供销社同样冲在了最一线。党委和理事会发出倡议，坚决贯彻执行市委市政府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各项决策部署，按照“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总体要求，全力推进落实疫情防控 and 复工开业等各项工作，用行动画出信念，微光成炬，希望犹在。

若干年后，当你再忆2020年的新春，你一定会记得——“供”担使命，并肩战“疫”。

系统作用独特，“供”有大能量

自疫情爆发以来，市供销社已累计向全市供应销售口罩1000余万只、消毒液10万瓶、洗手液12万瓶，以及防护服、护目镜等防疫物资，同时供应民生物资，如蔬菜、猪肉、大米等农副产品2000余吨，为这座城市的抗疫保供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什么市供销社能有如此大的能量？

这源自一场名为“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的系统攻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供销合作社工作，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发挥其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的决定（中发〔2015〕11号），推动全国供销系统开启改革进程。随即，上海市委、市政府也发布了支持上海供销系统深化综合改革的试点方案（沪府发〔2016〕16号），并组建形成了由全市10个委办局、各区人民政府为成员单位的供销社系统综合改革联席会议制度，

将改革工作部署落到实处。

改革集结号吹响的 5 年来，上海供销人锐意进取，多点突破，成效斐然。全系统坚持服务“三农”，建成农业社区经营服务网点 2000 余个；做大做强社区商业，推进社区农产品流通网络迭代更新，投资和承接社区商业建设招商，为城乡居民提供高品质的社区服务配套；市供销社系统还紧跟时代发展，探索新产业、新模式，推出“供销 e 家”老字号品牌集成店，参与田园综合体、产业园区、社区养老院等新兴产业投资建设，并设立市供销合作发展股权投资基金，不断提升为农服务能力和效能。5 年来，全市供销社系统上下贯通、整体协调，供销社系统的经济实力、发展活力和服务能力大大增强。

保障供应，我们有速度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上海供销社系统各单位守初心、担使命，全力以赴保障防疫物资、生活物资的供应顺畅，保证产品质优价稳。

上海各涉农区供销社的经营范围除了农资、农副产品及农村日用品供应的主责主业以外，大多数区供销社都合资参与医药连锁经营，关键时刻的使命呼唤让供销社冲上一线，联合抗“疫”、聚沙成塔。

嘉定供销社面对本次疫情大力担当，在春节工厂物资停产断供的局势中逆势而上，一方面深挖国内采购渠道，另一方面积极开拓全球采购资源，同时还为本区各医疗卫生机构、公安道口、各街镇及企事业单位等一线部门供应各类口罩 271 万只、测温仪 1 万余个、各类防护服、医用帽子、消毒液、一次性手套等共计 109 万个(件)，基本满足了一线的需求。

宝山供销社抢抓时机、力保供应，57 家药房、3 家菜场、4 个加油站、1 家大卖场、57 家超市便利店连轴转，为社会供应各类口罩 178 万只、体温计 2 万支、消毒产品 2 万余瓶、酒精棉球 1 万瓶，板蓝根、双黄连等近 3 万盒。为避免交叉感染，减少居民进入菜场频次，同时又让大家买到新鲜蔬菜，宝山供销社指导菜场公司开通微店，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开展蔬菜直供，并为小区居民免费配送到家。

松江供销社的余天成堂平日里就是老百姓信任的知名中医药店，本次其 60 家连锁药店作为市商务委指定口罩供应点，日均为松江居民配送口罩超过 6 万只，目前口罩采供总量已突破 278 万只，44 家医保定点药店疫情期间 24 小时营业，不间断提供各类药品，成为贴心的社区抗“疫”供给站。松江供销社松卫医工贸公司还为全区各单位及志愿者协调筹送 12 类医用物资累计超过 148 万件。松江大米应急加工企业中良公司第一时间组织复工，力保粮食供应不脱销、不断档。

崇明供销社医药公司党员干部吴海雄、季永康、季忠敏等人，春节期间每天在市区和海岛之间轮流往返。由于崇明地处海岛，酒精棉球等属危化物，只能通过轮渡运回，他们便搭乘凌晨 5 时首班轮渡出岛，物品运回后第一时间发放到各门店出售。疫情期间累计运回医用口罩近 70 万只，抗病毒药物、酒精和消毒液等物品 3 万余盒。

金山供销社发挥了供销、粮油融合发展优势。连日来，金山粮油购销公司机器轰鸣，已于 2 月 3 日提前复工。这家企业在确保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下，保证 15000 吨市级储备粮安全入库，同时加工粳米 1120 吨。企业白天做好市级储备粮入库，晚上加工粳米，并按照高标准严控水分、杂质等指标，确保一次达标，随时能够调得出、用得上。

浦东新区供销联社积极配合新区民政局，携手浦东社会发展基金等公益组织，紧急筹措医用口罩、防护服等物资，配备组装防疫“应急箱”，已向浦东 11 个街镇送出 634 个“应急箱”，为一线抗“疫”志愿者提供必备“武装”。他们自筹 20 余万只口罩等紧缺防疫物资，支援民生保障类企事业单位一线工作人员。完成政府平价口罩供应 202 万只，落实惠民实事。药店、超市等向社会供应医用物资 67 万件，稳供应、稳价格、稳预期。

疫情期间，快递停摆，出行掺杂着担忧与不便，村庄仿佛成了“孤岛”，日常用品、粮、油、米、面……

该去哪里购买？村民们焦急疑虑时，蓦然发现，青浦供销社日用消费品网络仍在运作，160

余家为农综合服务站大多依然营业，严守阵地……

市供销社直属市农资公司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全力做好保春耕农资供应工作，组织好农资流通和供应，确保农业生产不误农时，积极发挥农资供应的主渠道主力军作用，切实保障农资供应。他们与时间赛跑，克服种种困难，千方百计落实采购计划，疫情期间公路、水路运输不畅，他们不惜增加成本采用铁路发运，以确保农资产品供应。旗下农得利农资连锁公司各门店深入田头，对农业生产需求进行排摸，及时掌握春耕备肥备药和农户需求，统筹运力、统一调度，优化配送方案，节后 14 天内完成配送春耕所需物资 2000 余吨。疫情当前，农得利 80 余家农资网点仍悉数正常营业，通过电话订购送货下乡，打通最后“一公里”。目前，本市春耕生产所需的农资商品总量充足，品种齐全，质量有保证。

市果品配送公司，承担着本市不少宾馆、超市、卖场的水果配送任务，大年夜至 2 月底，累计配送各类进口、地产优质水果近 400 吨，价格坚持与往年持平，在非常时期担起非常之责，全力以赴助力市场供应的保障工作。

好唯加食品公司为了解决疫情期间顾客外出采购不便，通过公司外送平台、电商平台及时将调味产品打包配送至消费者的家中，在特殊的日子与客户守望相助。

同样，黄浦区供销社、普陀区供销社、长宁区供销社等城区供销社，也是“供”担使命、并肩战“疫”中的一面面鲜红旗帜。

不仅情系上海，上海以外也是上海供销社之情之所系。为安徽潜山市、江西寻乌县、安远县 3 个全国总社定点帮扶贫困县市组织手持测温仪等当地急需的疫情防控应急物资。2 月 1 日，当市供销社主要领导收到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

支援请求后，高度重视，及时行动，迅速组织到 300 台手持测温仪，在中国供销粮油公司通力支持下安排好运输车辆，于当天下午 2 时装车发运，层层接力，次日即将捐赠物资送达三地。在防疫物资极为紧缺、物流运输无法确保的时期，这 300 台测温仪显得尤为珍贵。

使命责任担当，只因守住初心

疫情中，直面基层各种急难愁盼，扛起社会责任的大旗是供销社系统始终坚守的政治担当。

“师傅您好，请配合量一下体温”，崇明供销社的志愿者站立在阴雨绵绵的寒夜不断重复着上百次这样的话语。G40 沪陕高速崇启道口是上海北面联结全国的主动脉口，誉为上海“北大门”，当春运返沪高峰到来时，崇明供销社派出 23 人的青年突击队值守路口，做到逢车必检、逢人必检，守护城市安全。

当社区防疫成为防控工作重点时，嘉定供销社紧急组建了一支 217 人的志愿者队伍，在周末下沉社区开展志愿服务，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冬夜很冷，他们却说，逆风而行的心在燃烧。

奉贤供销社根据有着 2654 名国内外青年人才居住的奉贤乐活青年公寓特点，火速成立乐活青年社区防控工作临时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者队伍，筑牢防控一线战斗堡垒，组织由 77 名党员干部组成的志愿者队伍，每天分批到乐活青年公寓、南桥大菜场、两条“路长制”街面 257 家商铺进行防控志愿服务，确保将防疫工作做到严丝不漏。

宝山供销社主动配合区政府的征用需求，将所属的 2 家宾馆共 175 间客房作为疫情隔离观察点，自觉履行供销社企业的社会责任。

全力以赴战疫情，齐心协力保民生，这，就是上海供销人的速度与担当！

2020 年乡村产业十大关键词

●商 远

2019 年 6 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提出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力争用 5—10 年时间，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值占县域生产总值的比重实现较大幅度提高，乡村产业振兴取得重要进展。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随着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2020 年农业农村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2020 年乡村产业工作要点》等重磅文件的相继出台，笔者梳理出了乡村产业中的十大关键词。

一、特色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支持各地立足资源优势打造各具特色的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特色产业，尤其是发掘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景观优势和文化底蕴，开发有独特优势的特色产品，可以推动产业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2020 年农业农村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中提到支持各地聚焦优势特色主导品种，打造各具特色的农业全产业链，培育一批产值超百亿元的区域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放到乡村产业的具体工作中来看，即有序开发特色资源；建设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着力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培育乡土特色品牌。提升优势特色产业的质量效益水平。

二、加工

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可有效提升乡村产业“附加值”。积极发展农产品初加工，发展粮变粉、豆变芽、肉变肠、奶变酪、菜变肴、果变汁等初

级加工产品，提升农产品品质，满足乡镇居民消费需要，可以把就业岗位更多留在乡村，把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在产能布局、技术创新、标准制定、加工深度上做优化。建设农产品加工园区，则重点支持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一批各具特色的农产品加工园区。引导地方建设一批区域性农产品加工园，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农产品加工园体系，构筑乡村产业“新高地”。

三、融合

《2020 年乡村产业工作要点》中提到，将大力推进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乡村产业层次水平。这其中包含主体、业态、产业融合三方面。

主体融合，将支持发展行政区域范围内多主体参与、产业关联度高、辐射带动力强的大型产业化联合体，构建政府引导、农民主体、企业引领、科研协同、金融助力的发展格局。业态融合，将跨界配置农业与现代产业要素深度交叉融合，形成“农业+”多业态发展态势。产业融合，将以资源集聚区和物流节点为重点，促进产业前延后伸、横向配套、上承市场、下接要素，构建紧密关联、高度依存的全产业链。

四、精品

积极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可增添乡村产业发展亮点。今年乡村产业将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建设一批设施完备、功能多样的休闲观光园区、乡村民宿、农耕体验、农事研学、康养基地等，打造特色突出、主题鲜明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

五、土地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破解乡村发展用地难题。

尤其要完善乡村产业发展用地政策体系，明确用地类型和供地方式，实行分类管理。

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前提下，通过村庄整治、土地整理等方式节余出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优先用于发展乡村产业项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通过入股、租用等方式直接用于发展乡村产业。按照“放管服”改革要求，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审批进行全面梳理，简化审批审核程序，下放审批权限。推进乡村建设审批“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抓紧出台支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地的政策意见。

六、人才

《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2020 年农业农村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中提到，将加快建设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高素质农民培育计划，着力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突出产业导向开展分层分类培训。并推动出台加强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完善农业农村人才发现、培养、评价、激励机制。

人才资源是产业振兴的关键。乡村产业在创新创业群体培育方面也将搭建要素聚乡、产业下乡、人才返乡和能人留乡平台，支持本地农民兴业创业，引导青壮年农民工返乡创业，将返乡创业农民工纳入一次性创业补贴范围，制定促进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农村指引目录。同时吸引一批农民工、大学生和退役军人返乡创业，引进一批科技人员和社会资本入乡创业，发掘一批“田秀才”“土专家”和“能工巧匠”。

七、数字化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了“三农”工作“数字化”的要求，提出将依托现有资源建设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加快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智慧气象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并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在此背景下，乡村产业将以信息技术带动业态融合，促进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生物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融合，发展数字农业、智慧农业、信任农业、认养农业、可视农业等业态。

八、利益共联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立健全农民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机制，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通过订单农业、入股分红、托管服务等方式，将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为此，乡村产业工作要点中鼓励发展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跟进，广大小农户参与，采取订单生产、股份合作的小型产业化联合体。

九、产业扶贫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强化产业扶贫。农业农村部在实施意见中指出，贫困地区应将扶贫资金更多用于产业扶贫，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扶贫项目，防范产业扶贫风险，提升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快培育贫困地区新型经营主体和脱贫带头人，完善联贫带贫减贫机制。建立产销对接长效机制，推动龙头企业、批发市场和电商平台与贫困地区形成稳定产销关系，积极推进消费扶贫。继续在贫困县实施农技推广特聘计划，加强产业发展指导员队伍建设，提高产业技术专家帮扶成效。

十、绿色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管理，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强化全过程农产品质量安全和食品安全监管，建立健全追溯体系，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农业农村部在实施意见中提出，将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提高农业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水平，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等方面持续推进，并连片开展绿色种养技术应用试验。

《2020 年乡村产业工作要点》要求创新发展绿色循环优质高效特色农业，建设绿色化、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推行低消耗、少排放、可循环的绿色生产方式，推进“生产-加工-产品-资源”循环发展。引导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与贫困地区合作创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原料标准化基地。

（作者单位：北京商业干部管理学院）

1982-2020 年 22 个中央一号文件概要（上）

●董 明

1982 年 正式承认包产到户合法性

1982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批转 1981 年 12 月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也是通常所说的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其主要内容就是肯定多种形式的责任制，特别是包干到户、包产到户。这份文件提出，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明确“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并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取消了包产到户的禁区，且宣布长期不变。文件的另一要点是强调尊重群众的选择，不同地区，不同条件，允许群众自由选择。同时还提出疏通流通领域，把统购统销纳入改革的议程，有步骤地进行价格体系的改革。

1983 年 放活农村工商业

1983 年 1 月 2 日，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从理论上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这份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两个转化”，即促进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文件提出，我国农村应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适应商品生产的需要，发展多种多样的合作经济，合作经济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按劳分配方式以及合作的内容和形式，可以有所不同；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调整购销政策，改革国营商业体制，放手发展合作商业，适当发展个体商业。并强调，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仍然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

1984 年 发展农村商品生产

当年的“一号文件”即《关于 1984 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允许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继续减少统派购的品种和数量；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1985 年 取消统购统销

1985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名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文件明确提出，“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于此，30 年来的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被取消。

1986 年 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

1986 年中央一号文件即《关于 1986 年农村工作的部署》。文件明确指出：我国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大国，绝不能由于农业情况有了好转就放松农业，也不能因为农业基础建设周期长、见效慢而忽视对农业的投资，更不能因为农业占国民经济产值的比重逐步下降而否定农业的基础地位。

2004 年 促进农民增收收入

2003 年 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收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出台，并于 2004 年 2 月 9 日公布。时隔 18 年之后中央就“三农”问题再次下发一号文件。当时农业农村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纪 80 年代的 1.8:1 扩大到了 3.1:1。农民增收困难不仅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也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意见》提出，要“坚持

‘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文件共 22 条，提出了一系列含金量高、指向明确的实实在在的政策措施。

2005 年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2005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文件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并强调，要“以严格保护耕地为基础，以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为重点，以推进科技进步为支撑，以健全服务体系为保障，力争经过几年的努力，使农业的物质技术条件明显改善，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明显增强”。

2006 年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06 年 2 月 2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文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农村人口多是中国的国情，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文件全文共 32 条，八个部分。文件强调，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重点在“多予”上下功夫，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

2007 年 积极发展现代农业

2007 年 1 月 2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公布。文件明确指出，新农村建设要把发展现代农业放在首位，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扎实、健康地向前推进。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

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

2008 年 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加大“三农”

投入 2008 年 1 月 3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公布。2007 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当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抓住了保持经济稳定和促进农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亦可统筹兼顾农村各方面的工作。全文涉及的政策性要求和措施有 40 多处，其中让农业和农民直接受惠的可以概括为“三个明显”“三个调整”“四个增加”“四个提高”和“两个大幅度”。体现了中央关于给农民的实惠要逐步增加，随着国家财力的增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要进一步加大的要求。

2009 年 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

2009 年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2009 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呈现四大新亮点。一是农民种粮支持力度再度加大。包括加大对农业的基础设施和科技服务方面的投入，加大对农业的各项直接补贴等。二是加大力度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文件提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增公益性就业岗位，要尽量多使用农民工；采取以工代赈等方式引导农民参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农村民生建设重点投向农村电网建设，乡村道路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农村沼气建设，农村危房改造等 5 个领域。四是农地流转强调进一步规范。对于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毫不动摇地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方面，2009 年一号文件首先强调要落实和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重点做好两方面工作：对集体所有土地的所有权进一步界定清楚，并且保障其权益；对承包地地块的确权、登记和颁证工作。

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王 洋

目前我国农业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和变化中的需求,我国农业缺乏竞争力、比较效益低下、基础脆弱、后劲不足等问题比较突出,表现为农户生产经营规模小,生产标准化水平低,产品交易成本高,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较弱,小规模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不匹配。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样才能把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变为千家万户相互联结、共同行动的合作生产、联合经营,实现小规模经营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加快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项伟大事业,对于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健全双层经营体制,促进农业现代化都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当前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现状及其特征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已经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都在不断提升,政府的主导作用没有变,农业合作组织已经成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力量,私人服务部门的服务也越来越广泛。综合国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的做法,结合我国现有国情,我国应加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建设,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要重视发展农业科技、金融、信息等基础性服务,要加快发展针对农业产后的相关服务。

目前我国农户生产经营规模普遍较小,生产经营条件比较落后,现有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农户对各种服务的需求程度由强到弱依次是农业科技服务、农业信息服务、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服务、农业信贷服务、农机作业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农业产后服务、

农业保险服务。从支付能力来看,有近80%的农户有支付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能力,但是我国低收入农户与高收入农户收入差距偏大,且地域分布不平衡,因此支付能力在不同地区会有较大差异。

二、健全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

目前,我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的服务功能发挥不充分,服务主体提供服务比重较低,农户对各服务主体的评价偏低,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持续稳定的发展离不开服务主体高水平的服务和农户的积极参与。对于农业社会化服务而言,农户与服务供给者需要在磨合中不断适应和提高,从而促进博弈结果不断优化。只有适应市场需求,真正能够给农户带来实惠的服务才会最终被农户所接受。

三、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几种模式

按组织主体的不同,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模式可以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自助式服务组织主导型三种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模式。政府主导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模式适合于经济发展滞后、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这种供给模式能够有效促进其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在短期内见到成效。市场主导型供给模式适用于经济较发达、农民组织化程度较高、具有较强服务消费能力的地区。自助式服务组织供给模式适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户受教育程度较高、农户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近年来,农业社会化服务在发展现代农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总体水平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从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变化来看,农业科技服务、农机作业服务、农业产后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服务水平均呈显著的上升趋势,与上述的服务发展水平相比,农业信息服务水平增长幅度还不够快,农业金融服务与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服务发展不够稳定。从地区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来看,据笔者对黑龙江、山东

疫情冲击下数字农产品流通模式的探究

●洪 涛

新冠疫情对农产品流通领域带来的多样性影响以及基于疫情而采取的应对对策,正在加快农产品流通模式的创新

一、新冠疫情对农产品流通业的影响深远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带来的影响,从规范化、数量化角度而言,可以分为负面影响、零影响、正面影响;有短期的影响、中期的影响和长期的影响;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新冠疫情影响的复杂性,也投射到农产品的流通。

负面影响主要是对农产品流通实体,如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关闭、广州花市提前关闭,导致农民、农产品批发市场损失惨重。春节后 2 月 10 日具有“亚洲第一、全球第二”美称的昆明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开业,交易是平常的 40%。正面的

影响则是新冠疫情带来数字经济的“火爆”,如果说 2003 年 SARS 冲击,促进了马云淘宝网的成功,那么,这次的疫情可以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的生态发展。特别是许多数字化农产品批发市场、数字转型的农产品企业在疫情期间“最后一公里”表现出来的交易“井喷现象”。

二、疫情期间许多“非集聚性”活动“井喷”

新冠疫情期间,聚集性、直接性交易减少,随之而来的是非聚集性、间接性交易大量增加,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出现了许多数字化农产品创新模式,从美团等社区生鲜的无接触配送模式、肯德基的无接触点取餐、盒马等企业首创的“共享员工”模式,到便利蜂的无人便利店,还有京东直播、淘宝直播、快手直播、抖音直播、蘑菇云直播、微盟直播等六大平台的直播卖菜,等等,

陕西三个省份的 32 个县、41 个乡镇、60 个行政村展开的、针对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问卷调查,山东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最高,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信息服务、农业科技服务以及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服务等方面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在农业产后服务方面,陕西省服务水平最高,其次是山东省,二者均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在农业金融服务方面,黑龙江省服务水平最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四、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总体框架: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的服务供给主体,它以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以龙头企业为骨干,以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它的服务对象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服务发展模式可以分为“政府+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农户”、“龙头企业+农户”等合

作模式;服务管理包括服务运行、质量和效益等方面。影响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的关键因素按重要性程度排序依次是:公共服务机构的服务效率、体系建设资金投入水平、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程度、龙头企业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贡献程度、服务质量、农民需求表达制度的完善程度、农民组织化程度、利益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组织管理水平。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好这些因素,促进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更快更好地发展。

要从自我发展与自我约束两方面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高效运行的实施机制,建立健全增强服务主体能力、提高服务效果、完善服务管理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通过落实服务主体建设、提高服务质量、完善服务体系管理、优化服务体系运行环境等配套措施,促进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作者单位:东北农业大学)

不一而足，十分火爆。

短短一个月，有的行业和企业处境艰难，也有的行业和企业却意外成为“企业网红”。2020年1~2月，在线教育收入达到1240亿元，增长300%。阿里钉钉举办的“新零售战疫增长营”直播课程有8802万人阅读，5327人参与讨论。良品铺子得益于数字化转型，在疫情期间，业绩不降反升。1月23日武汉封城，良品铺子选择逆行，把业务由线下转移到线上，提前复工。作为一家在全国有2300家门店、1200多个产品的零食企业，在疫情下保证了门店、电商、客服、物流的正常运转。并且在2月11日完成路演，24日在上交所成功上市，成为疫情期间的网红企业。

三、疫情下农产品绿色消费出现新特点

疫情时期，农产品消费需求出现新的特点：安全消费、健康消费、绿色消费、智能消费、生态消费的消费理念迅速形成，需要上游供应端用“高效、安全、健康、绿色、智能的生态链和生态圈”去满足这些需求，具体表现为服务、品质和品牌，由此也催生了一些新的业态，如数字化的商品、数字化的交易、数字化的物配供应链、数字化的结算与供应链金融。还有数字化的经营环境，如对人流、车流、空气温度、湿度、质量进行数字化管控，以及对人、财、物的数字化管理模式。

四、疫情下多种数字农产品模式创新

疫情下，中国农业展览协会农产品电商工作委员会和惠农网等多家平台联合发出《农产品供应保障联合行动倡议书》，许多平台积极响应，如农产品网络平台提供免费服务，对商户提供支付优惠、产销对接等，缓解了农产品滞销的矛盾，满足了城市基本生活需要。

一是农产品电商平台，如阿里、京东、拼多多、苏宁、供销e家、中国邮政、惠农网、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采取社交电商的方式，实现了“联产品、联设施、联标准、联数据、联市场的“五联”，以及通乡村振兴、通内外市场、通品牌质量、通源头可溯、通模式创新的“五通”，实现滞销农产品与疫情地区城市消费的精准对接。

二是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如昆明花卉拍卖交

易中心、广西糖网、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等，采取平台+农民合作社+农产品供应链的方式实现“五联”、“五通”。

三是农产品批发市场，如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郑州万邦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采取“市场大户+基地+农户”的方式实现“五联”、“五通”。

四是品牌零售企业，如超市发、家乐福采取“农超对接”的方式实现“五联”、“五通”。

五是生鲜农产品企业采取“新零售”的方式，如每日优鲜、盒马鲜生、京东到家、苏宁小店、美团买菜、美菜、朴朴超市、叮咚买菜、春播、菜丁、大润发等企业，采取微信、APP、小程序线上下单，线下“无接触配送”等方式实现“五联”、“五通”。

六是农产品产区，如潍坊蔬菜产区采取“基地+市场+农户”等模式实现“五联”、“五通”，陇南贫困地区采取电商扶贫方式促进“五联”、“五通”。

五、探索数字农产品“拉式供应链”体系建设

一是加强“菜蓝子市长负责制”、“米袋子市长负责制”。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政府出台了许多政策，特别是最近正在审订中的《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使北京市场环境进入3.0阶段，特别是关闭野生动物市场。同时，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用市场的手段配置农产品人、财、物的资源分配，充分发挥市场的活力。如数字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农产品零售市场的数字化转型，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等。

二是充分利用移动网络、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科技，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特别是数字农产品流通产业的转型升级。

三是建设以绿色消费市场为导向的“拉式供应链”，探索中国农产品流通业全触点、全渠道、全场景、全球链、全客群的数字化转型模式，探索建立中国农产品流通高效、安全、健康、绿色、智能、生态产销体系。

（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供销e家”品牌之家

●孙振华

2019年12月29日，位于松江区人民南路的“供销e家”品牌集成店开业了！

“供销e家”老字号品牌集成店项目是上海市供销社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市国资两委的部署，主动把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上海“四大品牌”建设战略机遇的重点项目。该项目坚持走品牌发展道路，以“推进老字号品牌集成发展”为抓手，将农民与市民、农业与商业、线上与线下、品牌与服务、品质与生活的融合发展作为发力点，致力于打造城乡一体化流通服务的集成商，成为“四大品牌”建设的生力军，更好践行供销社的服务宗旨，服务上海、服务长三角、服务全中国。

从工业制造业的“江南造船”，到食品工业的“光明”，从“百雀灵”到“绿波廊”，上海的老字号品牌举不胜举，星罗棋布，它们凝结着上海服务，孕育着上海制造，支撑着上海购物，传递着上海文化，是上海打造“四大品牌”的基础和实力。在上海市供销社系统就有包括“丁义兴”“郁金香”“鼎丰”“唯加”在内的近30个著名品牌。这些老字号品牌，沉淀着供销社的历史，书写着供销社文化，延续着供销社的荣光。

作为一家全国性的电商平台，“供销e家”能够为农村电商提供运营技术、服务、数据、信息、结算等多方位的支撑，实现资源互换的商业生态模式。集成店将着力探索老字号品牌的新零售之路，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打造品牌展示和品牌体验深度融合的线上线下立体平台，讲好“老字号”的故事，擦亮老

字号的金字招牌。

新开业的松江“供销e家”老字号品牌集成店由上海市、区两级供销社主导，上海松江供销社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主营。邵万生、维加、鼎丰、上果、丁义兴等这些耳熟能详的老字号都是店里的当家品牌。说到邵万生，它从最早经营宁绍风味食品的小摊，发展到今天立足“中华商业第一街”南京路。它的鱼干、糟鳗鲞、醉蟹等糟醉食品以及虾籽酱油、糟卤、虾油卤等调味料声名远扬。从原料采购到加工生产直至经营销售，上海好唯加食品有限公司打造了调味品加工生产经营产业链，其主打产品油咖喱、白（黑）胡椒粉、糟卤、五香粉等海派菜肴的调味料，不仅畅销沪上，而且远销大江南北。至于上海鼎丰酿造食品有限公司的乳腐、酱油、食醋等产品，更是上海人地久天长的心头之好。除了这些，上海市果品有限公司打通了果品的上下游通道，在新疆阿克苏建立了苹果基地，联合海门猕猴桃基地等各大果园，并且网罗了全球各地的时令水果，满足了各层次消费者的需求。百年名企上海丁义兴食品有限公司，精选加工原料制作的枫泾蹄、豆腐干、丁义兴酱牛肉等久负盛名，频频获奖。

松江“供销e家”开业以来，许多当地居民被老字号商品独特的魅力所吸引，远悦近来，驻足采购，大家纷纷表示“老上海”的味道真好。愿“供销e家”越开越好，愿更多的“老上海”的味道飘进千家万户。

（作者单位：上海市松江区供销合作社）

加快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的思考

●王传雄

农产品流通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和社会的安定，及时解决农产品流通中的问题，对于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不断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产品流通体系对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 农产品流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环节。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全社会或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依靠各类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和经济组织的带动，将生产、加工、销售紧密结合起来，实行一体化经营。按农业产业化经营这一含义，发展龙头企业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环节。而扶持一批加工流通型的龙头企业、发展农产品批发市场，增强其竞争、辐射、带动能力，则可大大促进农产品的流通。因此，加快发展农产品流通，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环节，是实现农产品最终价值的关键，也是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措施。

(二) 农产品流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必然要求。农业产业化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基础上确立的农业经营形式。这一形式的首要特征就是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与流通各个环节都要根据市场机制来进行，最终进入市场。决定农产品市场价值高低的是农业产业化程度的深浅。

(三) 农产品流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要目标。农产品流通对农业产业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其龙头和优化功能可以促进龙头企业的发展，促进农业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基地化建设。

二、农产品流通体系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 物流环节效率不高。农产品流通一般经过以下几个主要环节：生产者→产地→运销

批发商→销地市场→零售商→消费者。其间还需经过多重检验，影响了物流的进度。

(二) 信息不对等。目前还有不少农村地区农产品流通体系不健全，市场信息的形成机制和传播手段滞后，农户缺少信息的指导，生产就带有盲目性，这也是导致农民增产不能增收的主要原因。

(三) 批发市场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农产品流通，已经形成了以批发市场为枢纽的流通体制。各地兴建的市场分布不尽合理、缺乏现代的营销技术与手段，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供求质量提高新阶段的需要。

(四) 质量偏低，流通效益不高。农产品大路货偏多，稀有具有影响的龙头产品和特色产品。

(五) 营销观念陈旧。目前，农民自己的营销组织不多，往往是被动地等待市场的选择。这就失去了较高的商业利润。

三、加快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的思考

(一) 从战略高度重视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农产品生产和流通需要同步建设和发展。一是理顺农产品流通管理职能，真正形成支持合力；二是政策支持，从战略高度加大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力度；三是按照“统一规划、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扶优汰劣、适度超前”的原则，结合《城镇发展总体规划和城镇商业网点规划》，制定和完善农产品批发市场、菜市场 and 农贸市场空间布局规划，防止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四是实行鲜活农产品流通环节减免税制度。

(二) 培育和发展一批大型农产品生产和流通企业，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按照便民利民、合理布局、调整结构的原则，科学合理制订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专项规划，提升国有控股比重，提升各级政府在农产品市场

内置金融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韩朝华

缺乏面向个体农户和小微工商户的金融服务一直是阻碍我国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十年来，中国乡建院在有关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在湖北、河南、广东、陕西等地农村开展了村社“内置金融”试验，在解决乡村小微金融服务短缺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值得关注。

一、何谓内置金融

“内置金融”的“内置”一词旨在强调这种

金融组织在结构上内在于乡村社区，因而与正规的商业性金融机构有很大不同。它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由农民在本村范围内筹资创办，其信贷业务也只面向村内居民；第二，它的运营管理依托组织成员的民主自治；第三，它的成员享有其全部经营利润，并承担其全部运营风险。就性质而言，内置金融属于农村合作金融的范畴。

二、内置金融的三个成功实例

出现异常波动时的调控能力。一是加大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交易设施、冷链、仓储、检测、信息等流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政策支持力度，增大农产品吞吐和平衡市场能力；二是培育和发展一批大型农产品生产和流通企业，下大力气引导农民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三是大力支持大型连锁超市、农产品流通企业和农产品直接采购基地建设，建立“企业（包括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鼓励企业和合作组织发展“订单农业”，与农户建立长期稳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销机制；四是整合平台，建立统一开放的农产品产销对接网络平台，切实解决广大农户信息不对称问题。

（三）探索发展新型农产品销售渠道，稳妥参与国际大宗农产品交易。一是在社区建立一批鲜活农产品直供连锁店、蔬菜直销车，依托电子商务平台建立社区直投菜柜；二是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尝试开展农产品期货业务，利用期货及衍生工具了解和掌握农产品现货市场行情的未来走势，实现大宗农产品套期保值；三是采取多种措施支持扩大农产品外销和出口规模。

（四）研究完善国民主要生活必需品储备供应制度。一是建立高效的国民主要生活必需品储备组织管理体系，以应对突发事件；二是建立国

民主要生活必需品和应急商品储备数据库，掌握商品的生产、库存、地域分布、运销能力等情况，对部分数据库信息按权限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共享，提高应急状态下的快速反应能力；三是建立一批区域性国民主要生活必需品储备中心，提高中央的调控能力；四是加大对国民主要生活必需品储备供应的政策支持和设施设备的投入；五是对关系农业发展命脉的种子业要加大国家控制力度，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收购、加工业、储备要加大对外资准入的监管力度。

（五）加快农产品流通发展，创新农产品流通形式。一是要培育多层次农产品市场，拓宽农产品流通主渠道。二是要创新农产品流通形式。三是要加大农产品营销力度。构建网上“绿色通道”，建立农产品交易平台，完善信息发布制度。

（六）采取多种手段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一是加快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增强规模效应。二是集中力量做大做强骨干龙头企业，提高竞争力。三是加快建设高效的市场营销服务体系，增强带动和支持作用。四是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和标准化进程，提高科技含量。用现代科技提升传统产业，不断推进龙头企业科技创新。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阳市供销社）

（一）湖北省监利县王小垸村

王小垸村是洪湖西岸的一个渔村，共有人口 2600 人，占地 6000 亩。村民大多以稻谷种植和水产养殖为业。进入 90 年代后，该村村民在种植和养殖上面临的困难不断增多，创收门路越来越窄。2005 年年底，中国乡建院院长李昌平与当时的村支书李花清商议筹建村社内置合作金融以摆脱困境。

李昌平从村外为这个合作社筹措了 10 万元的“种子资金”，村集体为其匹配 25 万元，还动员了村内 86 位 60 岁以上的老人入社，每人出资 2000 元。这样共筹集到了 87 万元的启动资金。按合作社的规定，李昌平和村集体提供的“种子基金”不参与利润分配，合作社运营所得利润除用于积累外，全部用于给老人社员的分红，以体现互助社“资金互助促发展，利息收益敬老人”的宗旨。2006 年年初，“王小垸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正式开业。

为了防控坏账风险，合作社建立了一套风险防范原则：第一，贷款不出村，只有王小垸村的村民才能申请贷款；第二，60 岁以上的村民不能申请贷款，且开始时每户贷款额以 5 千元为上限，现在放宽到 20 万元；第三，贷款申请人须用自己的土地承包权为抵押，且按土地的年租金水平决定土地的抵押价值；第四，合作社将出资的老人社员编成小组，并将贷款指标分解到各老人小组进行管理；第五，老人小组审批村民的贷款申请，并根据贷款额度由几个老人或其他村民（乡贤、社员）提供担保；第五，借款人夫妻都须在借款合同上签字。

2006 年当年，王小垸村的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获利润 10 万多元，每个老人分红 500 元，积累 2 万元。自那以来，王小垸村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累计为村民贷款 3500 多万元。到 2018 年，合作社资金总额达到五百多万元，形成公积金 10 万余元，且至今无呆坏账。社员人均累计分红 8560 元。

内置金融的发展给王小垸村的村民们提供了不断扩大的金融服务，有力地促进了全村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升级。现在，王小垸村已是当地的“虾

稻共生、双水双绿”示范村，并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小龙虾种苗和养殖技术输出基地。目前，合作社还在村集体的支持下筹建村养老中心。

（二）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郝堂村

郝堂村以前是一个山区贫困村，人口 2300 人，村域面积 20 平方公里。2009 年时郝堂村人均收入 4000 元左右，其中打工收入占 70%，农业收入占 30%。2009 年 10 月，郝堂村在中国乡建院的协助下组建了“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创业资本金共 34 万元。该资金互助合作社于 2009 年 10 月份开业。两年后，资金规模达到 650 万元。利息收入主要分配给老人社员。

同样，合作社建立了一套风险防范机制。由于合作社成员主体是村内老人，对村内居民的家庭情况和个人品性了如指掌，因而在面对借款者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到目前为止，合作社没有发生不良贷款，资金规模不断扩大，每年分红额逐年提高，深受村民欢迎。从 2009 年以来，郝堂村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累计为老人分红 139 万元，还积累了 80 多万元。

在此基础上，郝堂村开展了自然环境整治和收储土地，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村内的土地实现显著增值并带动村集体经济呈爆炸式增长。2015 年，村集体资产总规模超过了 8000 万元。借助养老资金合作社的金融功能，郝堂村将村民的 400 多亩土地集中起来建设新农村，发展旅游业，由此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归村民全体享有。全村许多村民也借此机会经营农家乐，目前郝堂村已经成为当地有名的人文旅游景点。

从 2011 年到 2015 年的郝堂村建设中，当地政府投入了 2000 多万元（路、水利、学校），村集体投入了 4000 多万元，村民投入了 8000 多万元。2013 年，郝堂村被住建部列入全国第一批 12 个“美丽宜居村庄示范”名单，还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美丽乡村”首批创建试点乡村。

（三）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张远村

张远村属于丘陵浅山农区，全村人口 1600 人，大部分人外出打工，大量农地处于抛荒和半抛荒状态，是一个典型的空心村。对于这样一个位置闭塞，交通条件和周边环境未得到明显改善

的村庄，李昌平给出的思路是，先建立村社内置金融，再依托内置金融收储村内抛荒和半抛荒的土地，实现土地集约经营。这样就能将村内被抛荒、半抛荒的农地动员起来，激活张远的内在经济活力。

由区政府提供资金 100 万元，中国乡建院匹配 30 万元，村集体提供 30 万元，形成“种子资金”，再动员张远村 7 位“乡贤”出资 21 万元，还有 20 位入社老人集资 6 万元（每人 3000 元），同时也接受村民现金入社或土地入社及房屋入社。2013 年年底，张远村内置（养老）银行开业，初始资金 189 万元。

张远村内置金融起步后第一年贷出 160 万元，以后贷款量逐年递增，2018 年上半年的贷款规模为 1100 万元，且至今未发生坏账。2018 年的利息收入可达 100 多万元。其中，40% 的利息收入分配给老人社员，人均分配将达到 2000 元；还有 50% 的利息收入用于自身积累，当年可积累近 60 万元。

自启动内置金融以来，张远村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一是全村的土地基本集中连片，实现了规模化经营；二是村里可以有更多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三是全村实现了自主发展，村内对贷款的需求逐年递增。有了这样的经济基础，张远村开始具备了展开美丽乡村建设的条件。

三、内置金融试验的现实意义

多年来，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业一直难以发展。而中国乡建院的内置金融试验在扭转这一局面上做了有益的尝试，在几个方面值得肯定。

第一，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亟需金融服务，存在着发展金融服务业的巨大潜力。但是，现有的正规金融机构都没有能力来把握这方面的商机。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类金融机构处于农村社区以外，信息不对称，无法形成风险防控体系。而内置于农村社区的合作金融组织却能凭借其与服务对象的天然地缘纽带，建立起特有的风险识别和防范体系，再加上村民土地使用权在村社范围内得以成为有效抵押物，就能较好地化解正规商业银行在小微金融服务上难以克服的风险防控问题。正

是在这一点上，内置金融试验有其独到的积极意义。

第二，内置金融机构在村庄内的吸储和放贷活动对一般商业银行的业务并不构成竞争。因为，目前我国的正规商业银行几乎都已撤离农村，连原本定位于服务农村居民的农信社也已蜕变为正规商业银行并日渐疏离农村。由此而来，我国的金融系统在面向农村个体农户和小微工商户的金融服务方面几近空白，而内置金融的出现则填补了这一市场空档。而且，这类合作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并不存放于村内，仍是要存入一般商业银行生息的，这不仅能增加正规商业银行的存款来源，还能降低后者向农村吸储的成本。如果将来正规商业银行能向各类内置金融机构批发贷款，则两者的共同发展还将为正规商业银行带来新商机。

第三，中国乡建院在内置金融的制度设计上注重利用村内土地使用权抵押来促进农地的流转和集中，从农地在村内向种田能手集中开始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这种做法能较好地与农村中既有的资源配置相衔接，至少在起步阶段是一种相对平稳的农业转型方式，它在实施上可能会比一开始就直接借助外来力量展开规模化经营的做法阻力更小。

第四，内置金融注重发挥老年村民的作用，使农村社区中既有的崇老文化成为村社合作金融制度的重要支持因素，这不仅促进了农村金融创新，推动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升级，还带来了弘扬尊老、爱老风气的社会效应，增进了社区和谐，还能为农村养老事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第五，内置金融的发展提高了村集体的公共服务能力，增强了村庄社区的凝聚力，并使干群关系得以改善。

综上所述，内置金融试验在满足农村小微金融服务需求、推动乡村振兴上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对于当前我国的农业转型过程意义重大，值得从政策上助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建立金融服务乡村产业振兴长效机制

●胡金焱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仍面临着中小金融机构供给不足、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较少、农村地区以及贫困人口融资难等诸多矛盾和问题。提升金融服务乡村产业振兴的能力和效果，关键在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金融服务乡村产业振兴的长效机制。

优化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少、业务占比低是金融服务乡村产业振兴的短板。优化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应坚持扩大金融机构增量、提升存量金融机构服务水平双向发力。在扩大增量方面，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积极发展村镇银行等多形式农村金融机构；探索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稳妥开展农民合作社内部资金互助试点；发展天使投资等新兴金融业态，加大对处于初创期的乡村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在提升存量方面，应推动传统商业银行建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小微支行和社区支行，增加“三农”业务比重；发挥好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积极作用，对农村交通运输、农田水利、农村饮水、农村物流、宽带网络等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有针对性的中长期信贷支持；发挥好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的主力军作用，拓展金融服务乡村产业振兴的广度和深度。

优化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目前，金融机构向农村地区提供信贷产品时，普遍要求提供抵押担保且产品和服务单一，难以满足乡村产业振兴需要。应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针对乡村产业振兴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供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精准服务。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金融科技手段，优化信贷流程和信用评价模型，提高贷款发放效率和服务便利度。推出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有效满足农户在生产、创业、就业等方面的合理融资需求。鼓励针对农业生产面临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较高等问题创新农业保险产品，为现代农业发展保驾护航。

还应结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对“两权”抵押贷款试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试点的经验予以总结推广，提升农村地区市场主体的融资能力。

优化金融风险防控体系。金融支持乡村产业振兴是金融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延续和深化，也是各类金融资源优化组合，进入新发展领域、服务新发展模式的创新实践，面临的难度大、不确定性高，容易形成新的风险点，必须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放在首要位置。应聚焦涉农领域风险识别难问题，建立覆盖广泛的风险监测识别网络，促进金融风险识别排查与农村综合治理工作互联互通，精准识别各类潜在风险隐患；聚焦乡村振兴重点产业，优化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机制，特别是在抵质押物认定、融资期限设计、金融产品定价等方面加强创新，提高金融支持乡村产业发展的安全性和针对性；聚焦乡村地区金融风险燃点低、规模小、传导快的特点，建立健全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对各类“小问题”早纠正、早化解，避免久拖成疾、扩散蔓延。

优化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县域是乡村产业振兴的主战场，也是逃废银行债务、非法集资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多发易发区域。引导金融资源流入乡村，要聚焦县域金融供给任务重和金融生态脆弱的双重特点，着力疏通金融供给渠道，大力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应把商业可持续和风险可控作为金融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基本原则，从严查处各类恶意逃废金融机构债务、骗取金融资源等行为；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和司法审理程序，提高金融领域相关案件的审理效率。着力加强县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金融科技应用、机构网点布局、金融机具布设、金融知识普及、金融政策宣传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提高乡村地区对金融资源的吸引力。

（作者系青岛大学党委书记）

试论农村金融转型发展

●何广文 何 婧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然带来中国乡村发展形态、乡村产业发展载体、乡村治理和服务形态、乡村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战略性转型，进而推动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健全城乡之间要素合理流动机制、提升乡村发展整体水平、加强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强化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此过程中，必将带来巨大的金融需求。

一、乡村振兴金融需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一）农村新型经营主体成为农村金融需求主体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农村人口的迁移、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传统农村发展模式下独立、分散存在的部分小农，将抛弃家庭非农收入“拐杖”，其金融需求出现转型；也有部分小农将逐渐融入适度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合作化、农民职业化发展的大潮。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基建、农业园区、农业公园、一村（乡）一品、一县一业、美丽乡村、特色小镇等建设的金融需求将不断增加，以大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农家乐及乡村旅游业主、创意农业主体、农村电商、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现代农业庄园主、农家乐业主、“双创”主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主体、田园综合体建设主体等形式存在的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将不断产生，作为新农人的新型职业农民的数量将会不断增加。乡村振兴时代的金融需求，主要来自于规模拓展主导的发展型产业发展的金融需求，生存质量改善型消费金融需求，并呈现规模化、长期化趋势。

（二）乡村振兴金融服务需求出现综合化、集团化趋势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特别是随着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进一步深化，农民

和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村产业发展的推进模式更多以“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合作社+农户”“社会化服务组织+合作社+农户”等产业化联合体方式推进。2018年9月底，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与农业农村部合作，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做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培育、龙头企业牵头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建设以及一村一品专业村镇发展等项目进行重点支持，并对龙头企业及其上下游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等提供全产业链综合金融服务。在这种模式下，农户具备了规模化经营的外部环境和条件，金融需求特别是信贷需求额度无疑将提升，促使乡村振兴金融服务需求出现综合化、集团化趋势。

（三）乡村振兴的金融需求行为具有低回报性、长期性

就推进和实施乡村振兴的具体内容而言，每一项任务每一个目标都将增加金融需求，并不断创造出新的金融需求。但是，乡村振兴的具体内容是难以用市场化的机制、通过商业可持续的方式来推进的。例如乡村发展的分类推进，提升农村劳动力就业质量，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工程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从经济效益角度而言，这些工程可能较多方面是长期低效甚至无效的，但在宏观上、整体上对社会有利，某种程度上具有公共和准公共物品属性。

二、农村金融面临的转型发展问题

（一）乡村振兴产生的金融需求，是较多金融机构熟悉而又陌生的领域

农业适度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合作化、农民职业化，是中国“三农”发展的大趋势，在此基础上，必将培育出更多的大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兴经营主体，并不断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93 号）指出，有条件的乡村，也将出现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的、集循环农业和创意农业以及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业业态、农业经营方式、农业经营主体都将发生变化，农旅结合、茶旅结合、果旅结合等一体化的农业综合体、农业公园将越来越多，农村金融机构面临的农村金融需求、借款主体对象将会发生变化，需进行产品、服务创新。对此，较多的金融机构仍处于探索之中，乡村新型经营主体贷款难问题仍有待求解。

（二）金融机构仍然面临服务“三农”的三大障碍

虽然目前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所依赖的信息不对称性程度逐步降低，服务成本有降低的可能性和基础，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乡村生产经营者的碎片化存在、信息积累不足、利用金融科技服务的有效性不足等问题仍将存在。同时，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出现的新业态，新型经营主体，仍然缺乏商业银行放贷时要求的法律意义上规范的抵押品，金融机构参与乡村振兴金融供给仍然面临抵押担保障碍。因此，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面临较严重的金融约束，金融服务排斥和信贷配给等问题。

（三）乡村振兴的金融服务需求难从资本市场获得满足

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各类业态和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具有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和回报低的特点。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特别需要稳定、持久的大额资金投入，以促进乡村产业向高科技化、互联网化、现代化迈进。在这一过程中，期限较长的投入需求较大。而银行业的产品多为 1~3 年期限的中短期贷款，资金供给额度一般也较小，无法充分满足乡村振兴的投入需求。资本市场是长期投资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其主要融资方式是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采用这两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追求的一般是本金的安全和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与乡村振兴的经济绩效有一定背离。因而，利用资本市场，虽可优化

乡村振兴经营主体的股权结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并更加有效地控制和分散风险，但难以满足乡村振兴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三、创新农村金融制度满足乡村振兴需要

（一）多角度促进乡村振兴金融供给创新

首先，促进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多样化。目前中国小农的数量占比较高，因而，深化普惠金融服务，仍然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可有效利用新型移动互联手段，结合普惠金融需求，实现金融产品 & 服务的创新。

其次，发挥各类金融机构的作用。满足乡村振兴时代的普惠金融服务，在发挥本地化的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地方性银行金融机构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大型商业银行的作用，切实利用大型商业银行的资金、技术实力和业务创新能力，特别是其强大的业务网络和互联网金融平台。同时，基于成员和社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合作金融组织，在向普惠金融需求群体提供信贷服务时，信息更对称，具有更好的制度优势和更高的业务绩效，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放宽金融市场准入，培育本地化、本土化、特色化的草根金融体系。

再次，利用科技成果进行金融创新。日益成熟的数字变革，使得银行核心业务流程变得更经济、精准，客户与实体网点互动减少，金融变成了伴随交易的一种机制。例如农行甘肃分行为“三农”发展专门设计研发的“金穗 e 融”系统，集融通、融资、融智、融商“四融”功能于一体，通过终端版、PC 版、手机版三种载体，提供覆盖产前、产中、产后的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的普惠金融服务，在创新金融服务中一揽子解决农民缺资金、短技能、找市场的难题，在资金、科技、互联网融合中实现了普惠金融服务。

最后，推动农村金融业务创新，突破乡村新型经营主体抵押担保困境。可利用嵌于农村社区的一些非制度性因素，如来自“圈子”内的信誉约束机制等，也可利用农村产业发展成果，在“龙头企业+农户”“合作社+农户”等产业链运行机制下，开展供应链金融，将乡村振兴经营主体的个体信用转化为团体信用，通过构建信用共同体，

实现金融机构与乡村振兴经营主体的顺利衔接。

（二）强化乡村振兴的金融需求侧的创新

第一，以互联网思维再造传统农业企业。互联网的普及，不仅突破了交易场所和交易时间的限制，而且使交易品类多样化、交易速度提升、交易环节减少。传统农业企业，也必须本着开放、平等、协作、共享的“互联网思维”进行再造，其方向是打造智慧型组织，从而获得发展。应有效推动城市化，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大力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第二，提升农业金融主体整体素质。对于乡村新型经营主体，要进行普惠金融教育，提升其金融意识和金融素养，特别是要培育其负债经营意识及金融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防止过度负债。同时要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技术培训和创业培训、财务管理培训、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培训和电子商务培训等，提高创业和经营成功率。

第三、搭建乡村振兴电子商务平台。借助互联网，促进乡村振兴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融合，构建“互联网+乡村振兴”“互联网+乡村新型经营主体”机制，提升生产效率和销售效率，这也是乡村振兴时代“新农人”的必然选择。

第四，推进农业的品牌建设。在设施农业、休闲观光农业已初具规模的基础上，要逐渐形成具有地方特色、带有产地特征的农产品品牌体系，例如新疆红枣、新疆哈密瓜、广西白色芒果、贵州都匀毛尖、河南信阳毛尖等。“绿色”“有机”“无公害”“国家地理标识”等具有代表性的农产品特色标识认证，是农产品品牌建设的重要内容，要取得与这些认证相关的成果，需要政府给予进一步支持和扶持。

（三）不断完善金融服务的辅助机制和配套措施

第一，构建差异化的农村金融监管体系和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体系和机制构建逐渐完善，但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社会的产权制度和经营制度发展滞后，产生金融需求的各种组织资源及其所具备的金融需求要素，不适应现代商业金融市场发展的要求，而现行的

刚性监管制约了金融资源在农村领域内的有效配置，不利于城乡金融资源互动，特别是不利于城市金融资源反哺农村。同时，农村金融监管方式与手段单一、农村基层金融监管力量薄弱、适应农村特点的金融监管体系尚未形成。因此，实施差异化监管可以促进农村金融组织发展、农村金融脱虚向实、资本要素回流农村、维护农村金融市场稳定，是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方法。要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的“改进农村金融差异化监管体系”落到实处，需要从监管目标和监管主体及对象、监管依据和规则等角度构建农村金融差异化监管体系。

第二，多角度构建乡村振兴金融体系。乡村振兴不仅需要银行等主流金融机构的服务，还需要从多角度、多方面构建乡村振兴金融体系，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促进乡村振兴的推进。例如可以进一步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创新“绿色金融、扶贫金融、互联网金融”，深化“农村信用、农村融资担保、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农村保险”四个体系建设。

第三，构建保障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持续健康良性运转的制度基础。针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需要较大的资金支持，可能需要进入国内外资本市场融资，例如发行债券融资、资产证券化融资、销售基金股份等；或者需要享受来自中央银行、财政和监管部门有差别政策。为此，就需要针对这些机构开展风险评级、绩效评价等。

第四，加快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一是支持现有期货公司提升资本实力，拓展场外衍生交易产品，参与农产品期货交易。二是支持大农户、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组织进行风险管理，推广“银行+涉农企业+期货+农户”产业链经营模式和“期货+土地（林地）流转权”流转模式，扩大农产品期货品种和区域覆盖范围。此外，还要运用风险补偿、贷款贴息、保费补贴、税收优惠、奖励补助等多种手段，引导金融机构强化乡村振兴的信贷投入。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供销视窗●

供销合作总社力促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

近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召开全国供销合作社扶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供销合作总社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系统定点帮扶了 580 个贫困县、驻村帮扶了 7705 个贫困村。今年，还将在着力解决好贫困地区农产品滞销问题、推进农产品产销衔接、与贫困地区建立长期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等方面下功夫。（中国供销合作网）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累计采购销售湖北农产品 6.25 亿元

截至 4 月 9 日，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累计采购销售湖北茶叶、香菇、小龙虾、粮油果蔬等各类农产品 6.25 亿元。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有关负责人表示，从疫情发生到这次助力湖北农产品销售，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担负起了搭建平台、组织货源、联产联销、应急保供的重任。扶贫 832 平台设立了湖北农副产品主题活动专区，并建立了农产品滞销信息快速响应机制，紧急研发上线了“供销应急通”小程序平台，推动了产销高效衔接。

（新华社）

上海市政协主席董云虎赴市供销合作总社调研

4 月 26 日，市政协主席董云虎，市政协秘书长贝晓曦、经济委员会主任徐建民、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邵林初、办公厅副主任孔戎等赴市供销合作总社调研。市社党委书记程颖代表领导班子作了综合改革及相关情况汇报，市社理事会主任张华、纪委书记岳凌军、财务总监王俊华、理事会副主任马晨辉参加调研。

近年来，市供销合作总社以为农服务为根本宗旨，坚持创新整合提升突破，当前正全力实施上海供销大厦、上海供销 e 家、上海供销文化三个重点项目建设，努力推动供销合作事业登上新台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市供销社精心组织各类物资供应销售，在抗疫保供、复工复产中彰显独特作用。董云虎一行对市供销社系统奋发有为推进企业改革发展，助力打响上海老字号品

牌，立足新时代传承供销文化，并全力以赴保障防疫物资和生活物资给予充分肯定。

程颖汇报了市供销社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坚决做到两手抓、两手硬、两手赢，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积极推进落实企业改革转型发展的情况。（上海市供销合作社）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贵玉到市供销合作社走访调研

4 月 17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贵玉、市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戴柳、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赵伟星、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龚祖英以及财经委专职副主任委员吴祖强等同志来市社走访调研，了解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推进情况，市社党委书记程颖代表领导班子作了工作汇报，市社理事会主任张华、纪委书记岳凌军、财务总监王俊华、理事会副主任马晨辉参加调研。

肖贵玉高度评价市供销社系统在抗击疫情期间，全力以赴保障防疫物资、生活物资供应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和积极贡献，对近年来市社班子带领广大干部员工在企业改革转型中表现出的迎难而上、奋发进取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

程颖书记汇报了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市供销社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并介绍了上海供销大厦、上海供销 e 家、上海供销文化“三箭齐发”的特色工作，以及聚焦创新、整合、提升、突破的总要求，推进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设想。

（上海市供销合作社）

供销系统大力开展消费扶贫行动

4 月 16 日，全国供销合作社扶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对全系统投身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会议提出，大力开展消费扶贫行动，

助力脱贫攻坚。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喻红秋表示，全系统将按照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线上依托“扶贫 832 平台”等各类电商平台，线下组织系统商贸连锁、农产品批发市场等流通企业设立消费扶贫专区专柜，构建扶贫产品线上线下销售体系，促进各类流通、电商企业与贫困地区建立长期稳定的供销关系。积极组织开展贫困地区农产品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进社区等活动，动员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及全社会力量，通过“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等形式，集中购买贫困地区农产品。

(中国供销合作网)

上海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召开二季度工作会议

日前，宝山区社召开二季度工作会议。区社主任王心雄对全系统一季度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部署。会议号召全系统干部职工要加倍付出、加速推进，在疫情考验中激发潜力，在破解难题中抢抓机遇，咬紧全年目标不放松。各单位、各部门要在区社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定疫情防控、经济发展“两手都要硬、两战都要赢”的信心和决心，奋力攻坚“双过半”目标任务，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基础。

(上海市宝山区供销合作总社)

上海市奉贤区供销合作社参展对口帮困地区农产品推介会

奉贤区消费扶贫产品推介会日前举行。奉贤区供销社以推介会平台窗口，充分展示了区社所对口帮扶贫困区县的特色农产品，详细推介近年来奉贤区社通过公益+消费、线上线下等多种销售模式，不断加大对口帮扶、精准扶贫力度，让全区各街镇、机关事业及国企近 80 家单位进一步了解和支 持帮扶工作。现场还进行了产品品鉴活动，此次推介会为对口帮扶地区农产品搭建优质商贸展销平台起到良好的宣传推动作用。

(上海市奉贤区供销合作总社)

上海市青浦区供销合作联社召开一季度工作会议

日前，青浦区社召开 2020 年度工作会议暨一季度工作会议。区社党委书记、主任沈金华强调：要坚定信心，牢牢抓住青浦两大战略平台带来的发展空间，不断开拓进取，为农服务和产业转型升级两手抓，两手硬，尽职履责，切实担负起新时期供销社的光荣使命。区社副主任姜文辉部署 2020 年行政工作，纪委书记戴秋怡部署 2020 年党建工作。

(上海市青浦区供销合作联社)

上海市金山区供销社召开大米销售工作推进会

日前，金山区社召开做大做强米销售工作推进会，区社副主任孙利军出席会议，为农服务部、金社米业、便民公司及配送站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围绕贯彻落实 2020 年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大做强金供大米单品销售和“金供优选”品牌，提出具体目标和措施。会议要求各涉农企业要高度重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危”与“机”，针对消费市场上大米供应链的特点，市场价格的波动，要充分发挥集团优势，抢占市场。

(上海市金山区供销合作社)

上海崇明供销合作总社废弃农药包装物回收处置工作有序进行

正值春耕农忙季节，崇明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户们正挥汗劳作。与此同时，各类农用物资产生的废弃农药包装物也将大量产生，必须及时回收处置。为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自 2005 年开始，崇明区社就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废弃农药包装物回收处置工作，各乡镇的每个行政村都有村级回收员，负责回收划定区域内田间和农户家中的废弃农药包装物，再交投到供销社设立的回收站点，由专业资质的公司处置。随着疫情的逐渐好转，根据复工复产的工作要求，崇明区社所属的 27 个废弃农药包装物回收网点已规范复工。(上海市崇明区供销合作总社)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所有制结构变革发展要论

●傅尔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其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长期实践探索的伟大创造。所有制结构问题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关切到我国改革发展、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若干重要方面，意义重大，值得加以深入研究探讨。不久前上海市经济学界专家就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全国、上海所有制结构改革发展阶段、规律、依据、主线和指导思想进行笔谈，述论如下。

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变革发展阶段和规律

黄文忠（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经过 70 年尤其是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今天我们已经到了总结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变化的经验教训的时候。怎样总结呢？要借助科学方法。我以为应当采用邓小平所倡导的生产力标准作为研究方法，就是按照经济增长速度划分，不受五年计划执行时间的限制，对增长速度高的阶段和低的阶段，分别找出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变化的规律性现象，进一步总结出适合现阶段基本国情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即最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

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因此是水涨船高的。适合现阶段基本国情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应该是最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在生产资料

所有制问题上，凡是急于求成的，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苏联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我国人民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企图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结果是饿死人，人民公社解散了，转向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与计划经济相适应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从追求“大公纯”一元结构到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多元结构。1978 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人们思想观念开始发生大转变，极大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农村实行“双包”责任制极大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带来了农业连年大丰收，农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改善提高，城乡市场开始走向繁荣。

今天，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且将“长时期”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基本的国情。因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模式，必须长期坚持和发展完善。

陶友之（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初 30 年生产关系的三次大变革与改革开放 40 年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和发展。

新中国的前 30 年对生产关系进行了三次大变革。

第一次大变革是解放初期对旧中国生产关系的变革，在农村大规模开展土地改革，分土地给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在城市没收原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切财产，归社会主义国家所有，改变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由此调动工人、农民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全国生产力的发展，短短三年时间，遭受国民党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

第二次大变革是从 1953 到 1957 年对新生产关系的完善，主要抓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公私合营，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广大农民、工人、店员翻身当家做主人，劳动积极性一下子爆发出来，大大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第三次大变革是“拔苗式”建立超前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发展欲速则不达。这主要反映在“大跃进”和“文革十年”两个时期。在“大跃进”时期，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急于向“共产主义生产关系”过渡。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所有制，割了农民小私有的尾巴，在城市掀起了小集体所有制向大集体所有制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浪潮，否定按劳分配，否认穷富差别，打击了农民、工人的劳动积极性，生产力发展大受影响，国家和人民全面进入困难时期，后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才使生产力重发生机。1966 年开始进入了“文化大革命”时期，1967 年上海“一月夺权”后，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其目的就是要建立“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虽然后来被否定，但极左思想仍影响到经济建设各个方面，生产力发展一次又一次受到严重阻挠。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非公经济”、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使非公经济有了一席之地。到 1997 年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概念。十五大报告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从个体、私营经济的逐步发展、地位的逐步提升，到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全形成，前后大概化了近 20 年的时间。

朱国栋（上海商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所有制结构变革三大阶段与所有制结构变化的客观规律。

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变革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

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个阶段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片面强调追求一大二公，认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越纯越好。第二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五大之前，在这一阶段，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其它经济成分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第三阶段是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后，提出非公经济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所有制结构变革的历程表明，其变化是同人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认识，尤其是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认识相一致的。所有制结构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这就是所有制结构变化的客观规律。

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问题，是我国改革开放长期进程必须不断回答的问题。所有制结构改革，既包括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改革，也包括探索和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关于如何把握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挥主导作用。调整和完善过程中如何体现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又使得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必须要把握“适度”，必须要把握当时、当地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规律，永远是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

所有制结构中某种所有制占主体地位，即由其决定这一社会的经济制度。我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我国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即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生产过程中的平等关系、劳动成果由劳动者支配实行按劳分配、以及相应的交换和消费关系。同时，我国社会又存在多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这一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城乡集体（合作）经济变革发展阶段和准则

姚康镛（上海市工业合作经济研究所高级经

济师)：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合作经济集体经济的实践和理论是马克思合作集体经济思想中国化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合作集体经济发展走过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手工业合作化，第二阶段是 1956 年后过渡到“人民公社”和“二国营”集体经济，第三阶段是 1978 年后改革发展联股联劳的“新型集体经济”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合作经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农村集体经济土地承包制、经营权流转租赁制等大发展。但是，城镇合作集体经济被“边缘化”、“碎片化”，全面深化改革步履艰难。如何“不走老路、邪路”，如何走出思想理论误区，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合作集体经济思想的缘起和中国化，如何坚持中国特色合作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向，需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和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开放的思路，总结多种形式合作集体经济的成功实践，提升理论创新能力和水平，迎接城乡合作集体经济“黄金期”的到来。

杨常胜（上海市侨办调研员）：计划经济体制中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国家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来源。

分析计划经济体制中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需要了解集体资产所套用的体制背景。在斯大林《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设定中，集体所有制比起国家所有制，是一种较低级的所有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家所有制居于金字塔的上层，其下是集体所有制。居于金字塔高位的所有制享受着特权与租金，居于金字塔下部的所有制输送租金，构成所谓“所有制—租金金字塔分配体系”。集体经济包括拥有涵盖整个农村地区的高度垄断特权体系，是计划经济所有制—租金金字塔分配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它是实现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城市吸纳农村社会剩余、国家所有制的工业汲取集体所有制农村剩余的主要媒介。

易幸麟（中共杨浦区委党校副教授）：在市场经济前提下，与个体生产积极性相结合，无论集体经营还是私企经营都是可行的。

实事求是说，不同产权所有制，都是有利的有

弊。集体所有制解决了规模化、多元化问题，但是在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出工不出力，大呼隆生产方式，个体积极性不高。包产到户后，个体积极性上来了，但土地经营碎片化，整体生产效率就低了。我认为，在市场经济这个充分必要前提下，只要抓住规模经济，与个体生产积极性相结合，无论集体经营，还是私企经营，都是可行的。集体经济前面已经有样板了，私企经营就是通过土地流转，民营企业领着农户进行规模化开发、多元化经营等。农户承包集体所有的土地折价入股，可以获得股东分红收益，参与公司生产劳动，取得工资收入，获益匪浅。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市场经济意识好的领头人，同样，私营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具备长远发展战略意识的企业家，集体经济也是需要公司化运作的。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变革发展的依据、主线和指导思想

黄伟（中共黄浦区委党校副教授）：1978 年后我国改革单一所有制结构，就是要激活和利用多元化的资本所有制结构来适应和发展社会化生产力。

所有制结构是一个很宽泛的范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五种成分，其实就是一种总体所有制结构。上个世纪 50 年代我国开展“一化三改造”，其实就是一场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运动，奠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这之后，我们又力图实现单一全民所有制，一直到上个世纪 70 年代后期，把个体经济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但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原理来看，这个所有制改革进度着实过快了。由于中国未经历完整的资本发展生产力的阶段，资本所有制尚未对生产力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1978 年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单一所有制结构，就是要激活和利用多元化的资本所有制结构来适应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偏向更好利用资本这一功能，同时实践又告诉我们，在容纳劳动力与世界的接轨中，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有利且更顺。所以，我们提出了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针。新

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 30 年,我国实施生产资料公有化集中,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和发展需要的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改革,正好为生产力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了所有制基础。40 年来我国改革开放,把资本发展生产力的能量迅速而持久地释放了出来。只有把所有制结构改革的理论说清楚,才能够使人们树立起真正的制度自信。

金彤(上海弈策智库高级经济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改革不断深入的主线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贯穿我国所有制结构改革中的一条主线,其结合点就在于各种产权制度不断完善。其中,主要是公有制产权制度的完善,在保障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促进其与市场经济逐步融合,非公有制产权制度重生,并且不断得到引导、鼓励和支持发展和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地位不断提升,作用不断加强。不同所有制产权之间的流转,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竞合互补,使得混合所有制经济长足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始终是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推动力。既突破所有制传统观念束缚,深化民营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知,也破除“全盘私有化”误区,深化认识国有经济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关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继往开来,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基本理论层面实现创新,要营造更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促进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要进一步完善产权平等保护制度,进一步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实现产权有效激励,从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傅尔基(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研究员):“十四五”上海所有制结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应当围绕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线和目标。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跨越“十四五”时期,上海创新驱动必须着力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从今后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目标、主攻方向和重点

任务来看,上海“五个中心”应是一个包括三次产业、经济结构、科技进步、投资、消费、对外贸易和投资、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等反映国际化地方国民经济综合指标在内的、包容上海国际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在内、以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基础、以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为支撑、代表国家有效配置、利用全球资源能力和追求、拥有国际领先竞争力的市场化、国际化、智能化、生态化和共享化的全球城市综合功能中心。“十四五”时期,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上海创新驱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和显著优势,上海所有制结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应当在有利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和开放枢纽门户四大功能,促使综合实力高质量提升上取得新突破,促使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上获取新成效,更好满足高品质生活,在全国范围内走在高质量发展的前列。

陈承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新时代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坚持和发展“两个毫不动摇”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新时代,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所有制方面必须进一步克服“左”的思想干扰,促进非公经济的更大发展。虽然我国的民营经济在产值、利润、税收和就业等方面都超过了公有经济,但是并没有改变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削弱国有经济的指导作用。这是因为我国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和固定资产仍然是公有制占据绝对优势。因此,民营经济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我们一定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指导思想,使公有经济和非公经济都能在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中得到发展和壮大,以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如期实现振兴中华的强国梦。

(作者单位: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

十八届三中全会 对社会主义经济公式的新贡献

●黄文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一命题包含着对马克思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公式的新认识，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都是首次出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新贡献。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有哪几项？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经济公式差异甚大。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公式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在1984年以前流行的观点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个人消费品的按劳分配、以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计划经济等三项内容。1984年以后则是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有计划商品经济等三项内容。其中第三项内容的变化往往使人误以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发生变化的，从而混淆了现实社会主义同经典社会主义在大方向一致前提下的某些差别。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公式早已成为定论。

一、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特征中创建社会主

义经济公式

（一）1883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经济公式：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过程中，形成了对未来社会基本经济特征的共同看法。他们在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质的规定性的比较当中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同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相对立的是劳动者的公有制；同生产产品的资本家占有按资分配相对立的是个人消费品的按劳分配；同私人资本基础上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相对立的是产品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三项基本经济特征便构成了马恩社会主义经济公式的内容。马恩的论述不但散见于他们的多种论著，在《资本论》中还有集中的阐述。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共同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联合体成员消费”的生活资料的分配依据是“每一个生产者”的“劳动时间”，劳动时间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联合体把“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多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

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都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紧密联系着

的，因此是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三大特征都可以同社会主义制度划上等号。

按照马恩的设想，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建立在生产力比较发达而又远未充分发展的物质基础上的，所以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决定了实行单一按劳分配的必然性；由于社会主义阶段商品货币关系已经消亡，所以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必然是单一的产品计划经济，其实现形式包括对产品经济的计划控制、计划工作、计划调节、计划分配。兹将马恩的社会主义经济公式作如下表述：

社会主义经济=单一公有制+单一按劳分配+产品计划经济。

这是第一个诞生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公式。

（二）1891年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经济公式的修正：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

马克思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没有能够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某些新变化，不具有对社会主义经济公式做出重大修正的参照物。在马克思以后，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出现垄断的最新情况，经过深思熟虑，在1891年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草案“需要大加修改”，因为草案有关“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无计划性”的提法已经过时。依据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生产的；可是这种生产已经愈来愈成为一种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相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业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这就是说，工业托拉斯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此生产的无计划性不再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特性。由此，同资本主义无计划性相对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就不再成立。恩格斯用“减法”从马恩经典社会主义公式中减去“计划经济”一项，马恩社会主义公式便成为：

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

在恩格斯的上述新见解发表27年以后的1917年4月，列宁依据资本社会化的新进展进一

步明确指出：“早在1891年，即27年前，当德国人通过爱尔福特纲领时，恩格斯就说过，不能像过去那样说资本主义就是无计划性。这种说法已经过时了，因为既然有了托拉斯，无计划性也就不存在了。并且肯定地说：“现在指出这点尤为恰当”，“现在资本主义正直接向它更高的、有计划形式转变”。列宁在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更高的、有计划形式”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由一般垄断资本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这是资本社会化的最高形式，不仅是生产和资本的规模空前集中，而且国家对经济的调节日益加强，国家直接出面担任生产的领导和管理工作的，使生产接近于全面的社会化。所以列宁说：资产阶级政府内的经济管理机构是“同银行和辛迪加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机构，它执行着大量计算、登记的工作”，一旦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只要把资产阶级从这些机构中排挤出去，就可以利用这些机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个机构决不可以也用不着打碎”。显然，这样的机构足以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实施计划调节的工具。

由上可见，恩格斯和列宁在观察马克思以后资本社会化，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资本社会化的最高形式的新情况基础上，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计划性取代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性现象，对经典社会主义公式做出了合乎规律的重大修正，去掉了公式中的“计划经济”一项。列宁通过对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规律性剖析，在1917年5月对社会主义下了一个定义，指出：“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列宁第一次用公式明确了社会主义的两大制度特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列宁的表述比恩格斯用“减法”从马恩社会主义公式中减去计划经济一项内容的表达方式更加直接明了，即为：

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

这是第二个社会主义经济公式——恩格斯和列宁经典著作中的社会主义公式。

二、社会主义认识过程的曲折性影响着对经济公式认识的深化

随着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社会化程度的不断

提高，由私人资本到股份资本到垄断资本到国家垄断资本，资本主义生产的无计划性由主宰到弱化直至日趋消失，不再构成资本主义基本经济特征。所以，恩格斯——列宁公式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的实际。

但是一个世纪来，人们出于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对资本主义的憎恶，加上无产阶级革命胜利都不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得到实现的事实，使人往往只记住了马克思—恩格斯公式，而忽视了恩格斯—列宁公式，以致不仅把计划经济当作运行机制，而且当作社会主义制度特征，似乎成了天经地义。1952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提出来，“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斯大林又回到了1883年前的马恩公式。1954年苏联科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公开出版，则是对斯大林观点的注释，强调计划经济“是以新的、社会主义生产配置为前提的，它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配置有着原则上的区别。”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一个阵营（社会主义）、一个导师（斯大林）、一本教材（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种观点主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界的大背景下，马恩公式重新成为无可置疑的统治观点，在长达30年时间里支配着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界。一度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又从另一方面加强了斯大林观点，今天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公式问题上的“左”的表现，其实质是脱离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

诚然，旧中国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展，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总体上距离资本的发达形态差距甚远。但是旧中国有限的现代商品经济却相当集中，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特别是民国政权统治的中心地区周围大城市，那里不但有股份制经济这种资本社会化的资本形成，而且由于“四大家族”控制着绝大部分的现代工业、交通运输业、银行业、

邮政通讯业，所以那里的资本社会化已经达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不言而喻。这是中国特殊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的入口”。毛泽东在1949年3月准确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既然，比例虽小但控制力强大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主导着旧中国经济，那么，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只能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项。这就是说，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公式是恩格斯—列宁公式，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公式。可惜，这一重要观点长期不被认识，在实践上非常强调以集权控制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三十年后首先由邓小平带领走出了这一理论——实践误区。

三、邓小平对经典社会主义公式的新发展

现实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按劳分配主体。

三十年的经验教训让人从另一方面加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邓小平善于这样做，肯定了几个“最”，否定了几个“不”。1985年指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今天“还在摸索之中”。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是最大的国情。“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改革”。“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指出“四人帮”搞的是“假社会主义”。邓小平还总结了多个“不是社会主义”的实例：诸如“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贫穷”、“少数人富、大多数人穷”、“发展太慢”、“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等。从而否定了曾经有过的一些做法：诸如不断抓阶级斗争，对所有制不断搞升级过渡，经济上大跃进，分配上平均主义，把意识形态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最根本的是非标准等。

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找到发展方向。邓小平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里所说的两个根本原则就是指现实社会主义所必须坚持的经济公式。“共同富裕”是坚持公有制占主体条件下贯彻按劳分配主体的必然结果。因此，上述两个原则或“两个主体”同列宁的社会主义公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差别仅仅在于“两个单一”和“两个主体”之间。前者属于经典社会主义，是以发达资本主义灭亡为前提条件的；后者属于现实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主义首先诞生在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国家为客观基础的。

显然，邓小平公式是建立在深刻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础之上的。邓小平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经典定义出发，因此能够准确认识到：第一，今天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远未达到经典社会主义所要求的那个发展程度。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低水平、多层次、不平衡，决定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可能单一化，而只能居于主体地位，在主体以外还有多种所有制形式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第二，今天的社会主义同商品货币关系相联系着，其原因存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当中。这是经典社会主义设想中所没有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商品货币关系必然向发达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深化。这种发达商品经济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有的经济运行机制。既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所“共有”，而不是“特有”，也就不可能成为区分社会制度性质的标准。既然是运行机制，属于表层经济关系，而不是经济制度深层次的本质经济关系，也就不可能作为制度特征加以界定。

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他在1979年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5年又说：“问题是用什么办法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应该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样就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加速生产力的发展。”1991年指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十三届七中全会前夕，他指出：“不能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或者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1992年指出：计划和市场

谁多谁少，“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都是经济手段。”总之，在邓小平看来，市场经济非“资”非“社”、非“马”非“修”，是发达商品经济的产物，属于中性；是实现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手段，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种有效方法，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必须大胆运用市场经济。

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公式从经典著作转向现实社会，从外国移植到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上写下了第三个经典社会主义经济公式，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公式，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至此，可以把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公式概括为：

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主体+按劳分配主体（共同富裕）。

四、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公式的新贡献

社会主义经济=国有经济主导+混合所有制经济；

国有经济主导=国有经济控制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

逻辑结论必然是：具有国有经济控制力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公有制主体。

三中全会强调指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就是“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显然，当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得到很好发挥的时候，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也就显示出来了，“公有制主体地位”也就得到“巩固和发展”了。据此，笔者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公式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经济=国有经济主导+混合所有制经济。“公有制主体”地位从全社会深入到公司内部，不但对其他所有制经济具有引领作用，在产业链中发挥龙头作用，而且能在混合所有制经济内部发挥控制力。因此，只要坚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公有制主体地位”就会得到进一步拓展。这是因为国有经济主导由其控制力所决定，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公有制主体地位就体现在混合所有制经济当中。因此，具有国有经济控制

力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公有制主体。

随着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逐渐普及，多数企业都将是混合所有制，企业既有国有股，又有个人股，还有社会股、外资股，无法用姓“公”姓“私”的传统标准来衡量企业的社会制度性质。采用“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是水到渠成。显然，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到“混合所有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深化发展。因此，沿用国有企业或者私营企业来认定企业性质的思路将逐渐趋向淡化。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意味着公有制要通过产权的多样化，吸收民营资本进入，在股份制基础上，建立起混合所有制经济，同时允许包括管理层在内的企业员工持股。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也要鼓励发展成混合所有制，让公有制企业持股也鼓励员工持股，结果是企业的股权结构变化引起所有制形式变化。

既然“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现实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那么，社会主义所有制到底是什么样的？早在1985年邓小平尖锐指出：这是迄今“还在摸索之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待“摸索”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摸索”就是相当时期内无所适从，笔者以为可以从马克思经典中寻找依据。

几十年来，所有制问题上的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偏于意识形态作为论处标准，习惯性地把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解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以至于在中国，公有制一直变得十分意识形态化，而长期以来国有制又被看作是公有制化身。国有制=公有制，似乎天经地义。这种偏见所带来的，一是理论上出现了循环论证——讲社会主义就强调公有制，讲公有制就强调社会主义，于是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建立公有制就是确立社会主义——至于公有化的程度与生产力之间的关联度、公有制的形式、公有制的制度特性、公有制的阶段特点及其实现形式，似乎都无需区分了，只讲公有制一般而忽视公有制特殊；二是实践上追求彻底消灭私

有制，以及公有制的不断升级过渡，并且用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拿来丈量现阶段所有制。结果，当用生产力标准加以衡量的时候才发现又“付了学费”，却又找不到停止这种枉付“学费现象”的答案！其实，答案就在马恩的著作里面！就是社会所有制，只有现代市场经济才具备过渡条件。

可以肯定，马恩著作所依据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社会所有制”。现代市场经济的丰富多样性打破了意识形态束缚。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资本社会化，生产资料社会化，不同所有制的融合，才是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与现实要求的产物。混合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是马克思所指的社会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应当是“社会所有制”的这一重大发现，是于光远先生的重大贡献。由于光远考证发现的、被中央编译局认可的，并作为马恩著作最新译本依据的“社会所有制”取代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于光远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学问范例。

原来，混合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是马克思所指的社会所有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典型实例。同时，又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公式的新贡献，将现实社会主义公式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划等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公式，继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经济公式从经典著作推向现实，创造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公式之后，三中全会又将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公式从宏观经济推向微观经济，把马克思主义经典公式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社会主义经济公式，即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指导方针。社会主义经济公式从马克思到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经历了从书本到现实，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经济的丰富发展历程。可以肯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既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必然结果。

顺理成章的是：淡化所有制具有历史必然性。由此决定了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市场经济必然成为最大的中国特色，这一特色规定了所要求的公有

制，是与国际规范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从原先与传统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转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是一个改革到适应的过程。因此，公有制主体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公有制主体的质量需要区别与传统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以及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仅就公有制主体数量而言，要经历“高一低一高”过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主体，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目标模式。要是在改革开始和中途就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否则就是“私有化”，那就无法进行所有制改革了。途中比重下降的是与传统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而比重提升的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两种不同的公有制主体存在着质的差别。曾经对公有制比重下降的担心和划线做法，显然已经没有必要了。淡化所有制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市场社会主义”是国内外普遍流行的一个概念，曾经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公式一统天下的年代，这个概念作为批判对象论处，而今已被广泛接受为中性概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划时代命题，滤去了“市场社会主义”的负面涵义。这里笔者借用“市场社会主义”概念的方法论，以为可以把“与传统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两类经济现象，分别概括为“计划经济公有制”和“市场经济公有制”，借以区别不同经济体制。

三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最新公式是继邓小平公式新发展之后，又一个重大理论贡献。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经济公式，不但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历史意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特征和初级阶段特征的统一。同时，它还具有实践意义，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前提下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彻底打破对市场经济的恐惧感。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最新公式：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经济制度，把公有制主体从宏观经济引向了微观经济，强调在现代企业制度内部不同所有制经济的相容和互补，创造了现实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公式。如果说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主体+按劳分配主体（共同富裕），这一公式是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产物，那么三中全会公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和当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经济公式。这一新理论、新公式、新贡献，进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市场经济。诚然，社会主义制度所要求的公有制主体，从全社会移位到了混合所有制公司企业内部，公有制主体地位从百分率变成了控制力。

显然合乎逻辑的理论是：国有资本的力量不在于存量大小，而在于控制力，包括国有控股公司对其他所有制资本的吸引力，作为龙头企业对产业链的牵引力，对同类企业的竞争力。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取决于三个要素，资本规模、股权结构和资本效率。公司资本规模巨大，以至一般股东连 1%的份额也只能“望股兴叹”；股权结构与投资主体多元化相关；资本效率与经营管理相关。经营管理水平高的公司企业，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也就强，所以两者最终都取决于经营管理完善程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是新旧两个“36 条”的理论表述，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国有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并日趋完善，增强吸引力。两个“36 条”对国有行业开放领域写得很明确，但效果并不理想，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有待提升。市场的公正性在于资本总是流向效益高的地方。这是任何行政手段、思想动员所难以做到的。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足以答疑和破局。

（作者单位：上海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 的历史发展

●朱国栋

合作经济是以合作组织为基础。诸多合作组织的经济活动汇集起来，便构成全社会合作经济的总和。诸如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等，均是合作经济总体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马克思批判地吸取空想社会主义者合作经济思想基础上产生的。以后，经历了列宁、斯大林以及在中国的发展。在习近平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部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必将彰显巨大的理论威力。

一、马克思合作经济理论的产生

19世纪初叶，欧洲出现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正是这种天才思想，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直接的来源。

合作经济思想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傅立叶和欧文都是以合作组织作为理想社会的基层细胞。欧文提倡采用合作工厂和合作社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此他带领他的四个儿子和一些信徒，去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三万英亩土地，进行“新和谐”社会实验。实验虽然失败了，但欧文播下的合作思想种子却在全世界开花结果，合作运动不断发展。

马克思对当时的合作运动倍加赞扬。他说：

“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马克思还说它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但是马克思同时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这种合作组织中，“当然到处再生出并且必然再生产出现存社会的一切缺点。”

马克思说：“合作制限于单个的雇佣劳动奴隶，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能创造的这种狭小形式，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一种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的制度，必须进行全面的变革，社会制度基础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手中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合作制”的发展必须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之后，即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并依靠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才能实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工厂合作的基础上，还研究了农业合作。他们注意到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是小农经济，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废除继承权或农民所有权”。恩格斯说：“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

二、列宁斯大林的合作经济理论

俄国十月革命前，列宁、斯大林主要是在同

俄国民粹派的农业合作观点，以及国际合作运动的改良主义作斗争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合作理论。

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明确指出：“从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的时候起，从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着手有系统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起，合作社就起了根本的原则的变化。这是一种由量到质的变化。”“如果合作社普及到土地社会化和工厂国有化的整个社会，那它是社会主义了。”“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显然（主要）在于把合作社机构普及到整个社会，”对于农业生产，即农业社会主义化问题，列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小农经济是没有前途的，必须过渡到大农场的共耕制。“假若由这种分散的小经济过渡到公共经济，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一倍和二倍，”同时，列宁也清楚地指出：“这种转变，即由个体小农经济到共耕制的过渡，显而易见需要很长的时间，”“由个体小农经济到共耕制是涉及生活习惯的深厚根基的，千百万人生活上的大转变，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达到。”

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爆发了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在“一切为了前线”和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集的情况下，合作社不存在了，农村共耕制也未发展起来。

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总结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果断地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实施新经济政策。此时列宁写了《论合作制》，他说：“在私人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前者是集体企业，后者是私人企业。在国家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既是私人企业，又是集体企业。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它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列宁认为，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权力，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在这种条件下，合作制往往是同社会主义是一致的。

关于列宁的农业合作思想，在《联共（布）党史》中作了概括；“我国农业的发展，应经过合作社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前进，应

经过逐渐把集体制原则灌输于农业，起初灌输于销售方面，然后灌输于农产品生产方面的道路前进。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条件下，在有社会主义工业存在的条件下，组织得正确而包括有千百万农民群众的生产合作制，就是可能用以在我国建成完备的社会主义的手段。

斯大林从列宁逝世到大规模农业合作化之前，基本上是按照列宁《论合作制》思想推进合作化运动的。从1929年集体农庄运动开始后，急于求成，把集体农庄看作高级形式，把所谓初级形式的“共耕社”完全否定了。而且，残酷镇压富农，把上千万的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了。

三、合作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并运用于实践。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建设根据地的一项中心任务。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专门写了《组织起来》和《论合作社》指导边区的合作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毛泽东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经济理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不同发展阶段。为了发展农业合作社，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农业合作化应当同时开展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革命和改变农业落后的技术革命，并且必须贯彻“自愿互利”的原则。

在毛泽东合作理论指引下，党中央提出要坚持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逐步过渡的原则，准备用15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来实现农业合作化。但在1955年夏季以后，出现了“左”倾思想，农业合作化的步骤突然加快，在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而后又实现人民公社。由于机械搬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个别结论和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做法，偏离了中国的实践，产生了虚假的社员自愿，否定社员的主体地位，脱离了合作经济互助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制约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退回到“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对此，邓小平认为农村改革最主要的是变革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和组织形式，使生产关系和组织形式同生产力相适应。他指出，“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正是由于邓小平的热情支持与充分肯定，广大农民创造出的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经营方式，成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

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基础上，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农业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在邓小平关于我国农业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农村所有制结构初步实现了从单一公有制向多元化所有制结构的转变，各种新型专业合作社开始涌现，并且成为了农村统一经营的重要组织形式。

四、习近平新时代的合作经济理论

习近平结合中国国情，对马克思合作经济理论进一步继承和创新。他高度重视我国合作经济发展，将其作为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他在 2001 年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中提出，包括合作社在内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市场经济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的一个重要层次”，“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

2016 年在黑龙江调研时，习近平强调，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有助于农业现代化路子走得稳、步子迈得开。在诸多关于合作社的论述中，习近平把合作社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一部分，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强调要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2016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小岗村大包干等农业生产

责任制基础上形成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们党农村政策的重要基石，必须明确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根本制度，同时也强调要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习近平还指出，当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主体就是农民，未来“三农”事业的发展，主体仍然是农民，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

在关于如何发展合作社这一问题上，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打造“三位一体”综合合作。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就强调要发展农民的横向与纵向联合，着眼弥补双层经营体制的短板，大力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合作服务体系的改革发展，探索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在 2006 年召开的全省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工作现场会上，习近平对发展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体系建设作了宣传发动，并在之后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作出了全面部署。习近平强调，“加快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创新，是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在坚持和稳定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内涵，创造了新的形式，加强了农民专业合作的薄弱环节，为家庭生产经营进一步走向市场、走向现代化开辟了新的空间，可以说是农村生产关系和农业经营体制的又一个创新”。

供销合作社是中国特色合作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就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提出要始终奔着为农服务去，始终做到为农、务农、姓农；他在小岗村农村综合改革座谈会上，将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作为农村改革重点任务之一。

（作者单位：上海商学院）

可回收物增量背后的思考

●史少铭

上海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已过去大半年了，截至 2019 年 10 月回收量达到 5960 吨/日，7~9 月的回收量分别是 4400 吨/日，4500 吨/日，5605 吨/日（指标为 3299 吨/日）。真可谓一月一个样。充分彰显了上海市民生活垃圾分类意识正在逐渐加强，良好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正在渐渐养成，也表明上海的可回收物体系的健全和有效运行，为实现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提供了基础性的保障。

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工程，初战告捷的同时，需要对回收物量增的现象进行辩证分析，梳理出其中的对应关系，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更好发展。

一、可回收物源头减量与前端回收增量

2019 年 10 月可回收物的回收量是 2018 年同期的 4.6 倍，完成日回收量指标的 180.7%。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都是大幅甚至爆发性的增长。可回收物的回收量越大，末端垃圾处理的量就越少，节约的资源就越多，从而减轻环境保护的压力。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回收物量越大，意味着源头产生的废弃物越多，被消耗的原生资源也越多。这是违背国家《循环经济促进法》所确定的，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产生的减量化原则的，也有悖于建设“无废城市”所要求的源头实现废弃物减量。而且，在目前还不能够对废弃物实现“全回收”和“零填埋”的情况下，流通和消费过程中产生废弃物越多，环境被污染的风险就越大。因此，与垃圾分类前端可回收物的回收量增加相比，在生产、流通和消费源头减少废弃物产生的意义更大，对经济和环境的贡献也更大。

然而，在现实中对于如何从源头上减少废弃物产生并没有引起相关各方足够的关注。在实施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过程中，与生活垃圾分类相比，落实源头减量条款的力度明显低得多。国家规定的关于减少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资源消耗和废弃物产生的要求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从垃圾分类中可回收物量的不断增长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

清其流者，必先清其源。减量化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采取适当措施避免和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产生，是对废弃物产生源头的把控。而回收是垃圾分类产业链中的一环，可回收物在产生的源头减量，在前端回收增量，一减一增，资源再生利用实现了最大化，这才是提高生活垃圾全程分类效益的根本之道。

二、回收模式的时效性与持续性

在推进垃圾分类的实践中，产生了以“互联网+回收”为主要特征的回收创新模式，如：智能箱回收、绿色账户积分奖励回收、通过 APP 微信预约回收、“拾尚包”回收等，实现了回收模式的多元化。回收新模式增强了可回收物投放、交售的便捷性，对促进可回收物回收量不断提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如何使它们持续有效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多年前上海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有两个创新回收模式：“E 环 365”热线和“在线收废”。前者是由国家废旧电子产品综合利用工作委员会组织开发的为全社会提供包括电子产品注册、维修、回收、处理及综合利用在内的信息服务平台，但运行了 3 年就悄然退出了市场。后者是通过电脑、电话预约上门回收，并且实现了行业 21 个区联网。“在线收废”曾受到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在全国同行业中产生过极大影响。但如今已是名存实亡。那么，当下的回收新模式会不会步其后尘呢？这有待时间来回答。但目前有的回收模式运行后

产生的一些问题应该引起重视。譬如智能回收机（箱）回收，这是目前比较时兴的一种回收模式，只要通过微信扫码就可完成可回收物的投放，同时获得一定的奖励，受到了市民的欢迎。但突出的问题是经济效益低，甚至收不抵支。

“E 环 365” 热线及“在线收废”等回收模式由兴到衰的现象给我们的启示：任何一种回收模式必须有持续性才有生命力，而这种持续性源于技术上的可行性与经济上的效益性，二者并存才能被推广复制；源于再生资源来源的连续性与回收量的充足性，二者并存才能实现边际效益；源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的统一，才能体现回收模式的社会价值。

三、回收的正向激励与交投的公平性

为了鼓励市民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养成良好的垃圾投放习惯，不少社区建立了绿色账户，按积分数额给予兑换一定的实物或支付现金，这种方式是对于市民垃圾分类劳动的一种肯定，因为垃圾不具市场价值。然而，可回收物是有价值的，市民向智能回收机（箱）投放可回收物后，从回收经营者那里不论是按积分获得一定的实物还是收到现金，本质上是一种买卖行为，遵循的应该是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可是，在现实中违背买卖公平原则的现象还是存在的。最常见的是对投放的可回收物不是按质论价，而是不分品类全部按一个价格兑付实物或现金，而且往往低于市场收购价。

就投放者来讲，对这种交投的不公平并不在意，扔掉的垃圾还能小有回报，当然不会计较。就回收企业而言，智能回收机的经营成本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希望通过提高进销差价来弥补或减少经营亏损无可厚非，但在方法上违反了公平交易的原则。这种不公平的交易行为传递到回收行业，就扭曲了行业的经营行为，让社会对回收行业的营利方式产生误解。价格是市场竞争的敏感要素，随意压低收购价，部分两网融合的市场主体、特许经营者，就此取得低成本的再生资源，对大多数市场自由回收主体来讲是不公平的，会引各类回收主体间的恶性竞争，不利于建设一个竞争、有序、健康的回收市场。所以，在实施生

活垃圾分类，注重提高可回收物回收量时，切不可忘记市场规则和行业的诚信操守。

四、回收量与回收利用率

如何评估生活垃圾分类的绩效？回收量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回收量的绝对值能直观地反映一定时段回收的绩效，体现了回收的规模 and 水平，能为政府制定支持可回收物回收政策提供客观依据。但是，仅用回收量来衡量可回收物回收的绩效是不够的，而且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区域产生的可回收物的量不同，仅用回收量无法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因此，评估可回收物回收的绩效，除了用回收量作为依据外，还必须有回收利用率作为考量标准。国家对发展循环经济有一系列以相对值为指标的评估体系，如：工信部于 2016 年 7 月印发的《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 - 2020 年）》要求：到 2020 年底主要再生资源回收率为 84%，主要废弃物循环利用率为 54.6%；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35% 以上等。所以，要有可回收物回收利用指标，与国家的相关指标匹配。

回收利用率的含义包括两个“率”，即回收率和利用率。回收率高，一般而言意味着回收量大。回收是资源循环链的前端，是基础环节。但可回收物不能被充分利用成为再生资源，回收量再大，沉淀在仓库里，本质上讲仍然是垃圾，也就失去了回收的意义。想当年像鸡毛、鸭毛、猪骨等都能被回收，为什么如今反而被当做垃圾扔掉，原因就是不能被利用，没出路。利用是回收的末端，是关键环节。在用回收率评估可回收物回收绩效时候，切不可忽视对资源利用率的评估，利用率的高低反映了可回收物的利用程度和存量的增减状况。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议强调要聚焦瓶颈，解决痛点、难点，其中特别提到要抓紧解决低值可回收物的资源化利用的问题。低值可回收物的资源化利用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解决，将成为实现生活垃圾源头“三化”的瓶颈。用利用率来评估可回收物回收绩效，对于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单位：上海再生资源回收利用行业协会）

关于《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要点简介

●杨忠德

2006年2月26日，国务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制定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以下简称《预案》）。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已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调整为二级响应。为帮助大家了解《预案》这一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更好地从我做起，继续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现将《预案》中的部分规定介绍如下。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级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划分为特别重大（Ⅰ级）、重大（Ⅱ级）、较大（Ⅲ级）和一般（Ⅳ级）四级。

其中，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

（1）肺鼠疫、肺炭疽在大、中城市发生并有扩散趋势，或肺鼠疫、肺炭疽疫情波及2个以上的省份，并有进一步扩散趋势。

（2）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并有扩散趋势。

（3）涉及多个省份的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并有扩散趋势。

（4）发生新传染病或我国尚未发现的传染病发生或传入，并有扩散趋势，或发现我国已消灭的传染病重新流行。

（5）发生烈性病菌株、毒株、致病因子等丢失事件。

（6）周边以及与我通航的国家和地区发生特大传染病疫情，并出现输入性病例，严重危及我国公共卫生安全的事件。

（7）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二、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身心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社会安全等事件引起的严重影响公众身心健康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

其他突发公共事件中涉及的应急医疗救援工作，另行制定有关预案。”

三、工作原则

“（1）预防为主，常备不懈。提高全社会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意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做好人员、技术、物资和设备的应急储备工作。对各类可能引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要及时进行分析、预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范围、性质和危害程度，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行分级管理。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各有关部门按照预案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的有关工作。

（3）依法规范，措施果断。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立健全系统、规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制度，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可能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及时、有效开展监测、报告和处理工作。

（4）依靠科学，加强合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要充分尊重和依靠科学，要重视开展防范和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科研和培训，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提供科技保障。各有

关部门和单位要通力合作、资源共享，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要广泛组织、动员公众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

四、 应急反应措施

“划定控制区域：甲类、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报经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决定，可以宣布疫区范围；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可以对本行政区域内甲类传染病疫区实施封锁；封锁大、中城市的疫区或者封锁跨省（区、市）的疫区，以及封锁疫区导致中断干线交通或者封锁国境的，由国务院决定。对重大食物中毒和职业中毒事故，根据污染食品扩散和职业危害因素波及的范围，划定控制区域。

疫情控制措施：当地人民政府可以在本行政区域内采取限制或者停止集市、集会、影剧院演出，以及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停工、停业、停课；封闭或者封存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食品以及相关物品等紧急措施；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和设备。

流动人口管理：对流动人口采取预防工作，落实控制措施，对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采取就地隔离、就地观察、就地治疗的措施，对密切接触者根据情况采取集中或居家医学观察。

实施交通卫生检疫：组织铁路、交通、民航、质检等部门在交通站点和出入境口岸设置临时交通卫生检疫站，对出入境、进出疫区和运行中的交通工具及其乘运人员和物资、宿主动物进行检疫查验，对病人、疑似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实施临时隔离、留验和向地方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机构移交。

信息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作好信息发布工作，信息发布要及时主动、准确把握，实事求是，正确引导舆论，注重社会效果。

开展群防群治：街道、乡（镇）以及居委会、村委会协助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部门、医疗机构，做好疫情信息的收集、报告、人员分散隔离及公共卫生措施的实施工作。

维护社会稳定：组织有关部门保障商品供应，

平抑物价，防止哄抢；严厉打击造谣传谣、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制假售假等违法犯罪和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

五、 善后处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结束后，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织有关人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情况进行评估。评估内容主要包括事件概况、现场调查处理概况、病人救治情况、所采取措施的效果评价、应急处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经验及改进建议。评估报告上报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事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对参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作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联合表彰；民政部门对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英勇献身的人员，按有关规定追认为烈士。”

“对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报告、调查、控制和处理过程中，有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等行为的，依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对因参与应急处理工作致病、致残、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补助和抚恤；对参加应急处理一线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应根据工作需要制订合理的补助标准，给予补助。”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结束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对应急处理期间紧急调集、征用有关单位、企业、个人的物资和劳务进行合理评估，给予补偿。”

当前，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响应级别进行了下调，但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急速增加输入性防控工作难度加大；复工复产复学导致人口流动性增加，给疫情防控带来了巨大压力。我们要继续保持防范的意识，减少社会交流活动，减少不必要的人群聚集；家庭及办公场所要勤通风；出行时佩戴口罩，尤其是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时；要勤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作者单位：上海市外滩律师事务所）

梨花风起正清明

●袁 浩

清明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在仲春与暮春之交，也就是冬至后的第108天。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清明节前后雨水增多，大地呈现春和景明之象。作为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里人们除了扫墓，还有很多民俗习惯。虽然各地习俗不尽相同，但扫墓祭祖、踏青郊游是基本主题。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的这首唐诗国人耳熟能详。在唐代，清明这一天，人们或合家团聚，或上坟扫墓，或郊游踏青，活动多样。杜牧笔下的清明节虽凄迷感伤，但又不失情趣，前抑后扬，含而不露。这首《清明》成为清明诗的代表作。

清明节最早称为寒食节，即禁火吃冷食，“子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秋为一人。”唐代诗人卢象的这首《寒食》所讲述的即是寒食节的来历。相传，介子推乃春秋时期晋国国君晋献公二儿子重耳的门客。在重耳成为霸主的时候，介子推却偕同老母隐居山林，不要封赏。重耳放火烧山以逼他出来做官，但他宁死不从。在他死去的柳树洞里，人们发现他留下的劝重耳勤政廉政的一首诗，感其大义，后人设寒食节。

白居易有《寒食野望吟》，“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生死离别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写的正是清明节扫墓祭祀，缅怀先人，追悼亡灵的情景。写哀思逝者悲痛心情的，似乎要数高翥《清明》一诗最为著名，诗云：“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血泪染成红杜鹃。日暮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

一滴何曾到九泉。”

苏轼的《江城子》词是清明悼亡词中的杰作，“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一代豪放派词人，竟能写出如此缠绵婉约的词句，可见其对亡妻的思念之深。陆游也有“犹及清明可到家”的哀婉诗句，道出了千万游子清明盼归与亲人团聚的心声……

清明节还是一个感怀人生、激浊扬清的节日。苏轼的《东栏梨花》“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由景入情，豁达通透。黄庭坚的《清明》“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诗人由眼前的美景想到逝者，他感慨人生无论智愚高低，最后都是蓬蒿一丘，但是人生的意义却大不相同。

结伴出游也是清明节的主题之一。“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智慧的古人，在对清明节注入慎终追远文化因素的同时，还加入了踏青赏春的浪漫元素。骆宾王的《镂鸡子》是较早记录唐人清明节活动的五律诗歌：“幸遇清明节，欣逢旧练人。刻花争脸态，写月竞眉新。晕罢空余月，诗成并道春。谁知怀玉者，含响未吟晨。”所谓“镂鸡子”，就是在鸡蛋上刻画花纹，是当时流行于清明时节的一种风俗。

时至今日，放眼四望，正是春光明媚时节，春和景明，人们在清明节感恩尽孝，缅怀先贤先烈。珍惜来之不易的盛世清明，不负大好春光。

五月新鹅上市来

●钱桂华

中国人食鹅已有 1400 多年的历史。鹅肉鲜嫩清香，营养丰富。首先，它的蛋白质高，相比鸡肉 20.6%、鸭肉 21.3%、牛肉 18.7%、羊肉 16.7%，鹅肉的蛋白质含量 22.3%。其次，鹅肉的脂肪含量低，为 11.2%，而猪肉为 28.8%、羊肉为 13.6%。第三，脂肪熔点低。一般而言肉类脂肪熔点越低，质量越好，越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鹅肉脂肪熔点为 26~34 度，鸡、鸭分别为 33~40 度和 34~38 度，至于猪、牛、羊肉的脂肪熔点更高。综合以上优点，鹅肉作为绿色食品于 2002 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 21 世纪重点发展的绿色食品之一。

传统中医认为，鹅肉具有益气补虚、和胃止渴、止咳化痰、化解铅毒等食补功能。鹅肉脂肪中的胆固醇含量低，多吃鹅肉对预防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等现代文明病有一定的好处。现推荐几款鹅肉佳肴。

糟鹅。白鹅 1 只约 2000 克、香糟 150 克、黄酒 200 克、大曲酒 25 克、精盐 100 克、花椒 5 克、葱姜各 35 克。

制法:1. 活鹅宰杀后收拾干净，放在清水中浸泡 1 小时，泡出血水捞出沥干。2. 锅中放光鹅，加清水适量，烧开后撇去血污，加葱姜、黄酒，中火煮熟。起锅后在鹅身上抹一些盐，改刀成大块。3. 原汤撇去浮油和杂质，加入花椒、盐、葱姜，离火冷却。4. 冷却改刀后的熟鹅平放在盆内，洒上大曲酒，倒入原汤适量，再倒入吊制的糟卤，盖紧盖子，鹅块在糟卤内浸制 4—5 小时即成。食用时将糟鹅改刀成小块或条、片装盘，浇上糟卤。皮色洁白，肉质鲜嫩，糟味浓郁，味美可口。

酸菜鹅。净鹅 1000 克、酸菜 500 克、葱姜各 20 克、花椒 10 克、精盐 5 克、芝麻油 2 克、泡

辣椒适量。

制法:1. 将净鹅剁成 3 厘米大块，用开水氽烫一下，酸菜切丝，泡辣椒切丝，葱切段，姜切片，花椒剁碎末。2. 炒锅上火加清水，放入氽好的鹅块，再放入酸菜炖熟。3. 锅中放入泡辣椒、花椒、精盐烧开，滴芝麻油出锅即可。味酸麻辣，汤汁鲜美，鹅肉香醇。

西式罐鹅。原料:净鹅 800 克、香叶 2 克、番茄酱 25 克、白糖 50 克、精盐 3 克、味精 2 克、面粉、元葱、西芹各少许。

制法:1. 净鹅斩块，沸水氽烫，控干水分。2. 炒锅上火，加糖、番茄酱、香叶、精盐、味精、面粉、元葱、西芹同炒，盛出，与鹅块一起装入罐内，用小火煲 3 小时即熟。酸甜适口。

香菇蒸仔鹅。原料:仔鹅肉 750 克、水发香菇 50 克、胡萝卜莴笋各 200 克、鸡汤 100 克、芝麻油湿淀粉各 40 克、葱姜片、熟猪油、蚝油各 20 克、料酒 10 克、精盐 5 克、味精 2 克。

制法:1. 仔鹅肉切为 4 厘米见方块洗净沥干水。水发香菇片为两半，胡萝卜、莴笋分别削成圆球各 5 只，焯水后用清水冲凉。2. 仔鹅块入大碗中，加精盐 2 克、料酒、整葱、姜片拌匀腌渍 15 分钟。去掉整葱和姜片，加精盐 2 克，搅拌至发粘，再兑入蚝油、味精、湿淀粉、芝麻油和香菇片，拌匀后摆入扣碗中，入笼蒸约 2 小时取出，扣入圆盘中央。3. 取炒锅置火上，下入熟猪油，放进双色圆球，鸡汤、精盐、味精烧沸，用湿淀粉 5 克勾薄芡起锅。双色圆球相间摆放在仔鹅周围，将余汁浇淋在仔鹅肉上。鹅肉酥嫩松软，滋味鲜醇香美。

黔行散记

●刘古武

黔西北毕节：百里杜鹃开得正艳

人间四月天，毕节的郊野用铺山盖岭的杜鹃装点春天。

仰望这片澎湃于贵州屋脊之上绵延百里的绝色花海，不图回报、不施炫耀地恣意吐蕊，轰轰烈烈的冷艳，坦坦然然的优雅。惊羡这片天然原始林带虬枝盘曲，千年一叹、长相厮守，却年复一年、依旧如故地悄然相约。但见雄浑的大山披戴上妩媚的盛装，姹紫嫣红、行云万里……

毕节地名出自“比跻”一词，乃取之居此彝人的一家族名。其实，此地更早可追溯到当年曾经叱咤一方的夜郎古国所在。显然，花枝招展的夜郎国名不虚传，自大并非空穴来风。

黔西北晴隆：二十四道拐盘龙潜游

晴隆以面居崔巍峭拔的晴隆山而名，自是峰高坡陡谷深。然而，令晴隆名扬天下的却是此地一条伟大的公路。这条始筑于民国二十四年的公路，恰在大山之间盘旋了二十四道拐，恰如盘龙潜游群峦。这条全然凭借人力打造的天路堪称险峻公路的经典之作。抗战时期这条蜿蜒曲折的公路担起滇缅公路贵州段之重任，成就唯一的生命补给线遨游于云贵高原，交响着一曲非凡岁月的进行曲，二十四道拐终成历史的拐点。

如今，这条盘龙依旧逍遥于当年的沙土路基之上，只不过早已与巨龙的国度一起腾飞。

黔西南兴义：万峰林万峰成林

话说当年大旅行家徐霞客旅行于此，不禁被眼前万千林立的群峰所绝倒，由衷地赞美：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如今我辈步其后尘踏雪寻梅于此，在细数诸峰奇观之中仰慕先师的慧眼与真知。楚楚动人的万峰林堪称集锥状喀斯特地貌之大成，世代耕作于此的布依族村寨掩映田园春色，但见宅居与群峰相伴，不禁仰慕起布依族人来。

投宿兴义城，周围万峰如黛，但见闹市与群

峰为邻，不禁仰慕起得天独厚的兴义子民来。

黔南平塘：天眼乃观天巨眼

名不经传的平塘，却在一处得天独厚的喀斯特漏斗地貌造就的天然巨形凹坑内，凭空造就了世上最大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从此，观天巨眼遥望星空，试图寻觅天体中新的未知。于是，一方僻壤，石破天惊。

大诗人屈原在2300年前仰天长啸：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如今，这位先贤的子孙正在解读。

黔南荔波：丈量涵碧潭六十八级跌水瀑布

荔波涵碧潭坐拥六十八级跌水瀑布绵绵不绝于耳。于是，行至黔南，为的是那一方瀑流浩荡。

涵碧潭那天造地设的一汪着实让人心动。蕴藏一腔澄碧的潭水在狭长的幽谷中不徐不疾地一路吟唱，沿高低错落的河床跌水成瀑，无休无止。其实，涵碧潭又怎是一个“碧”字了得！其实，“荔波”在原住民布依族语中指一个美丽的地方。

黔东南雷山：西江苗寨千户聚

西江苗家千户环山聚居成寨，大片古朴的吊脚楼鳞次栉比地集结于此，宛若周围群峦般的磅礴氤氲。

吊脚楼里绵延着苗家世代传承，独具风情的长桌宴与苗家妹子摆起的高山流水敬酒阵，乃苗家人的习以为常的待客之道。苗家素有“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罗圈”一说，尤以独门绝技的酸汤鱼，常令食客欲罢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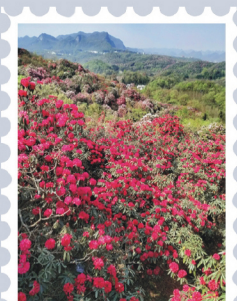
西江在苗语里为苗人西氏支系居住之地。相传苗人乃蚩尤之后，一个与汉人一般久远的民族。

黔中贵阳：品读甲秀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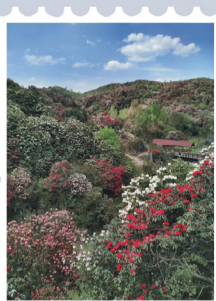
南明河蜿蜒四百里，流经贵阳城南。浮玉桥首，甲秀楼端坐四百年，稳占鳌矶，独撑天宇，在高楼巨厦相拥之中我行我素地坚守一份悠然与清欢。

飞檐甲天下，落影秀寰中——虽言贵阳老城遗构寥寥，然凭籍一座甲秀楼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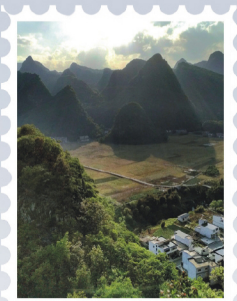
贵州风光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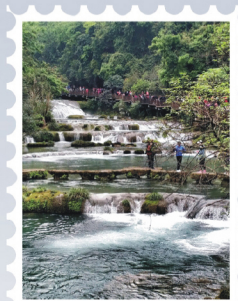
毕节百里杜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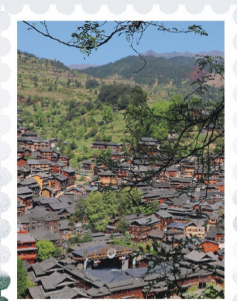
晴隆廿四道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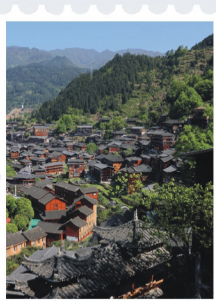
兴义万峰成林



荔波瀑流浩荡



雷山千户苗寨



贵阳高楼甲秀



平塘观天巨眼

上海供销社携手抗疫，共克时艰



94岁离休老党员郭阿富抗疫再捐2万元



农得利80余家农资网点打通农资供应“最后一公里”



果品公司党员冲锋在前保供应



好唯加公司打好防疫保供战



宝山供销人抗疫保供作贡献



松江供销余天成堂60家连锁药店为市商务委指定口罩供应点



金山供销人抓紧粮食储备入库



崇明供销青年志愿者值守上海“北大门”